

編者的話

这里汇集的十三篇文章，是旧社会农村残酷阶级斗争的写照，是农民血泪的记录，是对吃人的封建剥削制度和地主、恶霸的血腥罪行的控诉。通过这些血泪史实，使我们进一步认清阶级敌人的本性。

今天，全国人民获得了解放，农民的苦日子一去不复返了。劳动人民已经当家做主，过着自由幸福的新生活。但是，被推翻的阶级敌人并不甘心自己的死亡，他们的阴魂未散，还企图进行复辟。因而，我们要把过去的血海深仇牢记在心，树立坚定的阶级观点，在复杂的阶级斗争中，明辨是非，分清敌我，保持高度的革命警惕性，为保卫革命果实，为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奋斗。

目 录

血海深仇.....	1
旱年話今昔.....	12
沙田泪.....	18
虎口余生.....	25
六亲不认.....	34
揭开“族长”的画皮.....	42
宗族統治害得我家破人亡.....	49
农奴血泪.....	55
血泪斑斑忆过去.....	66
山丁忆苦.....	75
牛栏旧恨.....	80
他没有等到这一天.....	85
千万不能忘記过去.....	94

血海深仇

王文燧 欧阳英 戴 星 黄孕册

土匪头、大地主、军阀三位一体

卢兴邦的罪恶史，要从五十年前讲起。

卢兴邦是福建省尤溪县人，原名卢梁，当地人称他是“活魔王”。早年他是个不务正业的赌棍，后来投奔德化县莲花寺，拜匪首苏万邦为师，在苏万邦手下当个小头目。苏万邦死后，他带了二十多个匪徒回尤溪，投靠地主陈吓造、陈吓柳、陈吓鼎。他用土匪武装保护地主收租、放债；地主也拿粮钱支持他发展土匪势力。在地主的支持下，卢梁有了粮，有了钱，就大肆招兵买马，纠集兵痞、流氓、散匪，不几年，他手下的匪徒竟发展到几千人。接着又吞并了尤溪境内的几股土匪，便控制了尤溪整个县和附近各县的许多乡村。这时，卢梁的野心更大了。他改名兴邦，号光国，自封为“团长”。这一个小小的流氓、赌棍，就变成了一个骑在万人头上的大土匪头子了。

卢兴邦成了大土匪头以后，不满足于四处流窜、打家劫舍，便开始用武力占山夺田，当起敲骨吸髓的大地主大恶霸了。双鲤村的一些老年人告诉我们，当年卢兴邦向农民夺田占山的办法是世上少见的，他看中了哪家的一片好田，就写个条子或寄个口信通知业主，限某月某日带田契去卢家办理

卖田手續。田主答应把田卖給他，田金也要比时价少一半，田主不答应卖田，就要遭到飞来的橫禍。双鯉村农民陈昭芳兄弟有十九亩洋田，座落在双鯉溪边，不願意卖给卢兴邦。卢匪就采用了狠毒的手段对付陈昭芳兄弟。每逢下大雨时，他就叫爪牙用鋤头挖掉堤岸，引山水冲陈昭芳家的田。经过几次山洪的冲刷，那片肥沃的洋田一大半成了双鯉溪的河滩。卢兴邦霸占山林的手段更毒辣，他不用什么立契造約，他想要那座山，就叫狗腿子拿大鑼到山顶去敲打。然后出告示，宣布鑼声响到那里，他的山界就到那里。被他霸占了的山林，不許任何人伐树、砍柴，就連上山采菇的妇女，也会被匪徒們赶走，甚至打死。农民黄世章是靠砍柴为生的，有一次他上山砍柴，剛走到山腰，就被匪徒抓住。因为不遵守卢匪的这一套“法律”，匪徒夺下他挑柴用的尖竹担，就从他的嘴巴直插入喉嚨，把黄世章活活戳死了。

卢兴邦强占了許多田地山林后，就用高租重利进一步剝削农民。他把土地租給农民种，災年歉收，地租半粒不能减，碰到好年丰收，他又不顾租約，强要农民加租。每年收成季节，他家都派出一批“催租兵”，四出强迫农民交租。农民交了租，还要交给“催租兵”每人两元的“草鞋錢”。双鯉村农民謝生地，1940年租了卢兴邦的一片田，地租十三担六斗，这一年遭到風災虫害，只收了十三担谷子，交租还不够。卢兴邦見謝生地交不足地租，就把他抓了去，吊了起来，折磨得死去活来。謝生地的母亲怕儿子被吊死，只好到处求亲告友借谷子还清了租。当他还清了租子，卢兴邦又要他出“催租兵”的“草鞋錢”，几乎逼得謝生地傾家蕩产。

由土匪变成地主恶霸的卢兴邦，这时有地有财又有勢，

进而想当大官当軍閥了。当卢兴邦在尤溪山区进一步扩大了土匪武装以后，蒋介石看中了这个反人民的恶魔，决定培养他成为维护蒋家王朝的鷹犬。1928年，蒋介石委任卢兴邦为“师长”，承认无恶不作的卢匪集团为“中央軍暫編第二师”。当时，蒋介石公开叛变革命，正在发动反共反人民的第一次内战，卢兴邦便成了反共反人民的急先鋒。由于他对反共极为卖力，1933年，蒋介石提升他为“中將师长”，还特地派了許多軍事顧問帮助訓練卢匪，运来枪枝武器装备卢匪，还为卢匪請来日本技术人員，在尤溪潛下建立兵工厂，大量制造杀人武器，扩大反革命武装。卢兴邦就这样由大土匪头子变成了大軍閥。

賭棍出身的卢兴邦，从此成了福建“赫赫有名”的人物。这时，他不满足于仅仅在尤溪、南平等二十二县行使軍权，更进一步伸手要这些地区的财权、政权。因为有蒋介石的支持，当时的伪福建省政府只好答应把閩北地区的田粮、稅收、財政交他掌握，行政人員也由他委派。从此，閩北二十二个县都成了卢家的天下，县长由他委派，法庭、監獄、警察由他掌握，田粮、捐稅由他随意征派使用，銀行变成了他私人的財庫……总之，卢兴邦成了四大家族駐在閩北的忠实代理人。当卢兴邦五十生日时，蒋介石特派专人从遙远的南京給他送来金字寿匾，以“合庆百年”四字，作为主子对狗奴的賞賜。

野蛮的燒杀掠奪

卢兴邦用他的反动武装，保护着大地主的江山，鎮压着人民的反抗。这些匪徒們掠奪和迫害人民的罪恶，令人发

指，他們殺人放火的種種罪行，難以數計。尤溪的大坊、東嶺、七尺、七果、水東等三十多個村鎮，都被他一燒再燒，許多地方變成了瓦礫場、“無人村”。我們訪問了屢遭盧匪血洗的九都（梅仙鎮），這個不過一千人口，只有一百一十座房屋的小鎮，一次就給盧匪殺了三百五十多人，燒了一百零四座房子。當時躲在棺材底下目睹盧匪殺人放火的蕭祥听老人，今天十分悲憤地向我們控訴了盧匪火燒九都的罪行，那是1918年12月中的事，九都家家戶戶都準備過年了，盧興邦就趁這個機會攤派“過年捐”，不分男女老幼，每人都得交一塊銀元。一次又一次遭受搶劫掠奪的九都群眾，忍無可忍，組織起來集體抗捐。盧興邦看到群眾不願交款，就帶了兩百多個匪徒，挨家翻箱倒櫃，吊打勒索，許多人家的地皮被挖下三尺，值錢的東西都被搜劫一空，連婦女頭上的金銀首飾也不放過。財物搶光了，就到處点火燒房子，在朔風怒吼的清晨，九都鎮變成一片火海。最後，匪徒用十多條木船把金銀財物全部運走，把沒有逃脫的婦女、兒童和老人都趕到尤溪河灘上集體殺害。尤溪河邊躺滿了橫七豎八的屍體，鮮血染紅了尤溪河水，繁榮的九都鎮變成了瓦礫場。虎口余生的人們，大年初一无家可歸，只好含着眼淚，拿着飯碗草包，到外村求乞。

盧匪的殘忍是駭人聽聞的。盧興邦的爪牙陳國光殺害通濱村陳吓久的妻子時，先割去陳妻的左右耳朵，然後從頭到腳一塊一塊剝皮挖肉，最後把屍骨拋入河中。盧興邦的亲信卓光升殺害中心村農民于占元時，剝光于占元的衣褲，全身塗滿蜂蜜，把他綁在野外，讓昆蟲、鳥兽活活地把他蛀蝕啄食致死。城關居民嚴芳國不願當土匪，盧興邦就把他倒吊起

来，点几根大蜡烛插在他的腋下，将他活活烧死了。

数不清的苛捐杂税

卢匪当了大官，掌握了闽北二十二县的军、政、经济大权，亦匪亦官，又是地主，三位一体。因此，这个恶魔更是巧取豪夺，为所欲为。他到处设立捐税机构，征收苛捐杂税。农民养猪每月要交猪税，养牛要交牛捐，连娶妻生子也要交“喜捐”。当时尤溪的交通主要是靠尤溪河的水运，卢兴邦匪徒就在这条唯一的水路上设立许多税卡，光是从尤溪口到水



口就有十八个收税站，船工们经过这几十里的路程，就要交十八道捐税。我们在梅仙镇遇到一个名叫萧祥坤的老人，他的祖父、父亲和弟弟，在1918年全被卢匪洗劫梅仙镇时枪杀了。当时他孤苦零仃，无依无靠，只好去撑船谋生，没

想到又脫不了卢匪苛捐杂稅的剝削。他在尤溪河上辛辛苦苦撐了八年貨船，連吃飯穿衣都时常发生困难。有一个冬天，他从尤溪赤身撐船去福州，身上冷得发抖，在旧衣攤上买了一件旧衬衣，船撐回尤溪口时，身上的錢不够交捐，卢兴邦的稅棍，便如狼似虎地把他剛穿上身的这件旧衬衣剝了去。

卢兴邦对人民剝削掠夺，最惊人的还是濫发伪鈔。城关鎮农民郑上端拿出一張当年卢兴邦印发的“广豫券”給我們看，一边憤怒地說：“这就是卢匪杀人不見血的罪证。”他告訴了我們这样的事：卢兴邦在蔣介石授以軍政和財經大权后，先发行了一种名叫“华通券”的鈔票，强迫閩北人民使用，并且下令用黄金、銀元向他兌換。1932年，他又发行了一种名叫“广豫流通券”的新鈔票，宣布旧鈔票“华通券”作廢，限期以对折向卢兴邦私人銀行兌換新鈔票。他用新鈔票“广豫券”搶购了大量物資，換进了大量黄金后，又突然宣布發現有人“伪造假鈔票”，枪杀了替他印制鈔票的蔡国盛的哥哥和父亲，并立即宣布“广豫券”作廢。农民郑上端就在那时杀了一头一百二十斤重的肥猪，全部被卢匪用伪鈔买去，得了四十多元“广豫券”，結果第二天就变成了廢紙。許多老年人还向我們談起卢兴邦假借兴办学校、修桥鋪路等名义，騙取人民金錢的罪行。卢兴邦經常向群众派款派劳力盖学校，每盖一所学校，就要群众献地一百亩作“学田”，“学田”由他代管，他在学校附近建起“卢記倉庫”收学租；学租进了“卢記倉庫”，有进无出，成了他的“私租”。曾經当过鋪路工的老人蕭良云还讲了这样一回事，1940年卢兴邦又一次說要整修尤溪通南平的山路，就向群众派了两万多元修路捐；开工后，又一連三次向群众加派修路捐，还派兵到处抓人做苦工。最后这条山

路全靠民力修成，群众出的钱全部落到卢兴邦和他的匪徒们腰包里去了。他的部下匪县长洪镜元，只负责了一小段的修路工程，就捞了一大笔钱，在城关盖起一座堂皇华丽的三层洋楼。卢兴邦匪徒刮取的民膏民脂不计其数。卢兴邦的爪牙卢兴明所存放的黄金银洋，解放前夕，由他的儿子卢秋卿发掘出一处，就有银洋二万多元，黄金四十六斤。尤溪人民对卢匪的残酷经济掠夺表示无限痛恨。当时尤溪农村广泛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捐税如牛毛，明抢又暗夺，肥了卢家兵，瘦了老百姓。”

荒淫无耻的生活

在人民的血汗、尸体上，卢兴邦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就以他盖房子一事来说吧：卢兴邦盖了一座豪华的“卢公馆”，这座“卢公馆”在双鲤村，共有二百多个房间，到处雕龙画凤，连小门窗也刻上花鸟，镶上玻璃。曾经参加过盖这座房子的老人谢元欽、谢长尚，向我们讲述了卢兴邦当年盖这座房子的始末：

卢兴邦盖房子的这个地方，原来是一片良田，田边是一个大圩场，有饭店、杂货店，这里又是通往大田、德化的大路。1919年，卢兴邦当土匪经过这里，说是这里的“风水”好，后面的山象五头牛，前面的溪河象两条鲤鱼。后来，他废了圩场、拆毁了饭店、杂货店，强占了农民的田地，就在这里开始盖房子了。盖房子要用许多技术工人和劳力，他便派兵到各处半雇半抓地集中来两百多个木工、石工、雕刻工、泥水工，要他们长年累月在这里劳动，不准回家探亲，不准接见亲友。卢兴邦还从四邻几个乡村抓来一百多个劳力做粗工，

做工的人，每天自己带饭团去吃。卢兴邦还给每个民工定了每月的做工天数、每天的工作数量；农民谢元欵有一次被派了六工，做完五工后，突然生了病，卢兴邦便诬他故意逃工，就罚他再做十工。卢兴邦就是这样用人民的膏脂，在两年内，把这座“卢公馆”盖好了。盖好了房子，他又嫌门前有一条直线的溪叫“破肚溪”，留不住“财气”；屋后有一个山凹叫“破头夹”，会使“人丁不旺”。于是又劳师动众，强迫一百多个民工不分寒暑昼夜，从几里路外的山下挑土上山，填掉“破头夹”，筑成一座人造山；同时在离房子较远的地方，另挖条弧形的河道。新河道要经过一个小村子，那里住着黄阿年、黄阿其、黄阿培等六户农民，卢兴邦就出动匪兵把他们赶走，把溪流挖到他们门前去，把房子全部冲毁。卢兴邦把“破肚溪”改造成弧形的“玉带溪”后，又用民力在新河道的一头挖了一个深潭，让溪水注入，象征着无数财宝源源不断流入宝库。这时，卢兴邦坐在高楼上，一边可以欣赏美景，一边又可以听到水流发出“嘩啦！嘩啦！”的声响，他才满意了。光是这几项改造“风水”的工程，就强迫一百多个农民做了十年。这座房子前面原是尤溪通往大田、德化的大道，往来的人都要经过这里，这时卢兴邦竖碑宣布，“此路不通！”要行人绕过山后多走三里多小山路。新桥村有一个农民不服他的规矩，仍然走这条老路，卢兴邦的匪徒就抓住这个农民，说他的草鞋踩脏了卢家的门前路，把他脚上的草鞋强脱下来塞进农民的喉咙，硬把这个农民弄死了。此后，农民除了送税送钱到“卢公馆”外，平时没有一个人再走近这个魔窟。

曾给卢兴邦当过勤务兵的陈肇森，给我们提供了卢家的生活情况。

• • •

卢兴邦家中不过十口人，却长年雇了三个縫紉师专门做衣服。一家人不论大小，冬天穿的都是呢絨皮袄，夏天穿的都是綾罗綢緞。一家人穿的衣服每天都要是不同顏色的。卢兴邦有一个私人厨师，每日专门为他烹調山珍海味。卢兴邦还天天要用“人参湯”当茶喝。他不论到工地监工，到圩場看熱鬧，出門三十步都要坐上轎子。专门侍候他的仆人、管家不下三十个，比卢家主人还多两倍。每当他手下的爪牙們完成一項搶劫任务回来，卢匪便奖励他們吃、喝、嫖、賭三天。他的弟弟卢兴荣被人称为“狐狸精”、“猪八戒”，是一个出名的色狼。他前后討了三个大小老婆，到了五十多岁时，又用金条从四川买回一个十六岁的女孩子，做第四房姨太太。这个坏蛋不知奸污了多少妇女。他規定农民結婚都要发帖請他来喝酒，喝了酒，就乘机糟蹋新娘。林坑乡农民林阿寿結婚沒有发帖請他，这个野兽第二天便帶了一批匪徒，把林阿寿綁了起来，当着林阿寿的面，奸污了他的新婚妻子。林阿寿夫妻不堪凌辱，被迫一齐上吊自杀了。

1948年，杀人魔王卢兴邦病死了，他的弟弟卢兴荣便继承了衣鉢。这个有着剝削阶级本性的恶狼，他的罪行，并不稍逊卢兴邦。当时的閩北人民，特别是尤溪人民，依旧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卢匪的复灭

尤溪和閩北其他各县人民，对卢匪的殘酷蹂躪曾經进行了各种反抗斗争。有的村落里的群众还自发地团结起来，集体抗捐抗税，坚决抵禦匪徒們的搶掠。他們不惜流血牺牲，打击了卢匪的瘋狂气焰。至今，許多乡村里还傳頌着人民和

卢匪作斗争的故事。在离卢兴邦魔窟只有三里多路的地方，有一个住着三十多户人家的上白泉村，卢兴邦给这里的群众规定，十八至三十二岁的男人，都要为他当一年土匪，其他男女老幼，平均每八个人要出一百六十元银洋的“当兵费”，雇一个兵痞、流氓去当土匪。但是上白泉村的群众却不理睬这一套，大家带着财物，扶老携幼地躲进了深山，宁可住山寨住岩洞，也坚决不为卢匪效力出钱。匪徒们虽然烧掉了他们的旧屋，却始终抓不到他们的人，抢不到他们的财物。这样一直持续了三十多年，在解放前夕，他们还打死了好几个匪徒，弄得卢匪无可奈何。

当然，在万恶的旧社会，官匪相通，卢家的背后有着三座大山作为依靠，人民群众的这些自发的、分散的反抗斗争，是难以根本解决问题的。直到1949年秋，尤溪人民所盼望的日子到来了。强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横渡长江、摧毁了蒋家王朝之后，又浩荡南下，一路上以秋风扫落叶之势，将各地的大大小小的“蒋介石”一扫而光。卢家匪帮的末日终于来到了。

阶级敌人并不甘心失败。卢兴荣眼见大势已去，一面无可奈何地接受和平解放，一面又暗中唆使卢兴邦的儿子卢胜雄、卢胜威及卢匪旧属团长张胜高等主要爪牙，继续上山为匪，带领匪徒流窜尤溪广大农村。卢兴邦的三儿子卢胜泽则潜逃台湾，投奔蒋介石，梦想配合蒋介石集团卷土重来，重新奴役人民。但是匪徒们的垂死挣扎，终于挽救不了他们的死亡末日。解放初，曾饱受过卢匪集团压迫剥削的尤溪人民，积极组织民兵武装，配合解放军部队进行剿匪，击毙了张胜高等几个主要匪首；活捉并镇压了卢兴邦的两个儿子——卢

胜威、卢胜雄；大匪首卢兴荣畏罪自杀，其余的爪牙也紛紛繳枪投降。卢家小王朝终于土崩瓦解了。尤溪人民祖祖輩輩所向往的安居乐业的好日子实现了。

不忘血海深仇

长期遭受卢兴邦土匪摧殘破坏的尤溪山区，过去許多田园荒蕪、村庄絕戶，到处是一片凄凉。今天这里已經出現了一番嶄新的景色：卢兴邦当年强收了“修路捐”而沒有修的羊腸山道，已成了寬闊的公路；当年被卢兴邦匪徒一燒再燒后，成为瓦礫場、“无人村”的地方，今天已經盖起了許多新屋；过去被卢兴邦匪徒放火燒得只剩下四座房屋的梅仙鎮，如今不仅重建了家园，并且还新建了学校、街道、商店、邮电所，成为尤溪山区新集鎮；在尤溪城关，当年被卢匪强占为跑馬場、杀人場的地方，今天有的成了良田，有的盖起了医院；卢匪曾設过兵工厂制造杀人武器的潛下地方，已修建起一座水力发电站，給全县人民带来了光明……。整个尤溪山区，在三面紅旗的光輝照耀下，到处欣欣向荣。

“活魔王”卢兴邦和他的匪徒們魚肉人民的种种痕迹，终于被扫除了；但是，一切仇恨的記憶，是不可能从人民的腦子中抹去的，人民将永远記住这血海深仇！子子孙孙都将永远記住这血海深仇！記住这階級仇恨，用階級斗争的思想武装自己，坚决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旱年話今昔

朱开师 李盛文

坪石石头滿山坡，一陣暴雨冲成河，
无雨三天田土旱，月光底下晒死禾；
大旱来时人流散，百戶村庄絕烟火。

这是湖南郴县高礪公社坪石大队坪石村解放前流傳的一首民謠。坪石村到处都是山崗乱石，全村八百多亩田土，就分布在这些泥巴沒有牙齒深的石板上。山坡高，土层薄，晴得三五天，水田变成了旱地，一遇山洪暴发，泥土順水流去，成片成片的稻田被冲得露出了石板。解放前，这个村里的八十二戶人家，除开八戶地主外，其余七十四戶貧农、下中农，就租耕着地主这些薄泥石板田，經常失收减产，农民生活苦不堪言。遇上災年，那就更惨了！

逼租派捐更加紧

就拿 1942 年来說吧，

那一年，坪石村从春季到夏季，前后旱了七十多天，农民无法抗拒自然災害，他們佃耕地主的八百亩稻田，插下秧苗的只有一半，而且插下的秧苗，也因为水源枯竭，絕大部分干死了。

在这样大旱的年头，农民已經是九死一生，万惡的地主

和国民党反动派还要敲骨吸髓。他們看到旱年，深怕农民交不起租和稅，就派出爪牙，进门坐催，逼租逼債，抽稅派捐。

农民廖千盛佃耕了渾名“餓老虎”地主廖仁香十二亩“石板田”。批佃的契約上規定，“不論丰年歉年，定交铁租二十五担，一粒不能短少。”1942年，廖千盛耕种的田全部失收了。“餓老虎”可不管你田里有收无收，硬逼着要按佃約交租。廖千盛想减免一点，杀鸡办酒款待，苦苦哀求說：“香老爷，田里沒收到谷，請給我一条生路吧。”“餓老虎”吃罢酒飯，把嘴巴一擦，瞟着眼睛說：“种田不发狠，你还要减租，不行！不行！”說完，就掉头揚长而去。过了两天，“餓老虎”看到廖千盛沒有去交租，便带着狗腿子冲进廖家，当时廖千盛脚上患疮，他坐在床上一再哀告：“求老爷再寬容几天吧。”“餓老虎”哪里听得进耳，他恶狠狠地把千盛从床上拖了下来，廖千盛的老婆首弟香，怕撞破她丈夫脚上生的疮，立即跑上前去哀求：“香老爷，饒了他吧，租谷总会交的。”“好哇，你敢强詞答辯，来人啦，与我拉开她。”首弟香紧紧地抱住丈夫，“餓老虎”便自己下手，抓住首弟香的头发，按在铁鍋上乱撞乱碰。首弟香怀着八个月的毛毛，当即昏死了过去。她的剛滿四岁的孩子，也被地主摔到阴沟里了，吃了一肚子的污水。最后，“餓老虎”还逼着廖千盛写了十天交齐租的保证字。

一天、两天过去了，貧农廖千盛急得象鍋上的螞蟻，求借无路，他含着眼泪把和别人共有的半条耕牛卖了，又卖了一些別的东西，才交清了这一年的租。这还不算，“餓老虎”又以廖千盛拖欠租谷为由，夺了佃。当时，廖千盛臥病在床，想来想去，无路可走，便拿绳子，悬梁自縊。幸而他老婆发觉了，才被救了下来。

有的佃戶交不起租，被逼得借高利貸來交租。貧農廖苟全，那年佃耕地主廖潤武的几畝“石板田”，交不起租。廖潤武假稱好意，叫廖苟全請担保人，把欠八担租谷轉為借新谷，借一担還四担。廖苟全明知吃虧，但又不得不借。到第二年秋收時，連本帶利就是三十多担，三年滾成了百多担。廖苟全拿兩頭豬去還債，零頭都沒有還清。後來廖苟全被逼着替廖潤武打長工，每年勞動的工價，全部抵作借債，一直到解放那年，還沒有還清。

地主逼租逼債之外，國民黨反動派也要錢要糧，抓丁派款，敲榨勒索，什麼灶頭谷呀，人丁錢呀，壯丁費呀，等等，一共有十多項。貧農廖人見因為交不起灶頭谷，被本村的偽保長抓去打皮開血流，關進班房，最後逼着他典當了一口秧塘，才算完事。

流离失所餓殍多

田里遭災失收，加上地主逼租逼債，國民黨反動政府抽捐抽稅，全村農民的生活都陷入了絕境。沒有飯吃，就找樹葉野菜充飢，一個個餓得黃皮寡瘦，手脚發腫。後來，連山上的野生植物都吃光了。

貧農廖光生几天沒嘗過米水，實在餓不過，有一天，他碰到地主廖元林倒飯給狗吃，他從中抓了一坨，放在碗里。他很想吃一口，可是想起家中餓得難受的老婆和一個剛滿周歲的小孩，便想拿回家一起吃，不料給地主廖元林看見了，大罵道：“餓鬼，你吃了，狗還吃不吃。”他搶上一步，把廖光生手中的碗打落在地。廖光生挨餓忍飢，不久就死去了。他的老婆含着淚埋葬了自己的丈夫。誰知丈夫墳上的泥土還未干，

她和剛滿周歲的小孩也活活地餓死了。農民曹賽丙，飢餓難忍，有一天夜里，他悄悄地跑到地主廖子成的菜園里，拔了三個蘿卜。剛跨出園門，碰上廖子成的狗腿子，把他手中的蘿卜搶走還不算，還立即稟告廖子成。廖子成順手拿了一把鋤頭，趕到曹賽丙家里，眉毛倒豎，兩眼圓睜，曹賽丙一見，知道大禍臨頭，連忙跪在地上苦苦哀求：“老爺饒命！”廖子成那由分說，舉起鋤頭，朝着賽丙的頭部狠狠地打去，曹賽丙



仰后一躲，鋤頭落在膝蓋骨上，當即倒下，流血不止。廖子成還不罷休，又叫狗腿子用手捏住曹賽丙的脖子，把他一身爛衣服剝得精光，撕得稀爛。曹賽丙本來就餓得支持不下了，哪能經得起毒打，不久就死了。

有的人不甘坐以待斃，攜兒帶女

出外逃荒，沿門求乞，流落他乡；也有不少人把自己的亲生骨肉，卖给地主当了环婢女。世世代代给地主做长工的廖仁炳，这年脚被跌坏了，地主不但不给他医治，反而逼着他跛着脚天天出工。仁炳实在痛不过，哀求地主让他休息两天。狠心狗肺的地主，竟以“偷懒”为罪名，不给分文工资，便把他赶出了門。廖仁炳拖着跌坏了的脚回到家里，罐无粒米。他的第二个孩子廖小周牵着他的衣角哭着說：“爸爸，我要吃东西！”廖仁炳疼爱自己的儿子，不忍孩子跟着自己挨餓，他便把儿子送去当了小和尚。自己带着老婆、孩子，提着破籃，离別了家門，以后再也沒有看見他回来。

这一年全村一百二十二戶中，活活餓死的就有五十多人，有七戶全家死尽，絕了烟火，有十多戶出外逃荒，杳无音訊。真是哀鴻遍野，餓殍載道！

人民公社保收成

解放以后，特别是1958年，坪石村的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掀起了大修水利的高潮，全村劳力出动，只有半个月，就修起了一座面积约五十亩寬的大兴塘水庫。完工的这一天，社員們为了紀念水庫的建成，从远远的坦門口抬来一块千斤方石，竖在堤壩上，上面刻了这样一行大字：“人民公社力量大，修建水庫驅旱魔。”以后，又相继新建、扩建了一百八十多口山塘，形成了一个塘套庫、庫套塘的自流灌溉网，使全村百分之七十以上的田实现了自流灌溉化。

1963年，坪石遭到百年不遇的旱災。在抗旱斗争中，大兴塘水庫发挥了很大作用，使受旱的大部分稻田得到了灌溉。在干旱严重的日子里，全村三个生产队，发扬了高度的共产

主义風格，互相調劑水源，协作抗旱。下网塘，是解放前經常鬧水利糾紛的一个地方。土改时，下网塘划归第三生产队所管，他們年年整修扩大，这口塘由原来一个小塘变成了能灌几十亩田的大塘了。在干旱面前，第三生产队发揚了共产主义协作精神，調劑出水給第一生产队灌田。虽然当时第三队有几亩田急需放水。但是，他們顾全大局，宁願自己架起水車，把大兴塘水庫的水引来灌溉，而騰出更多的塘水給第一队灌田。因此这年下网塘周圍的田不但沒有受旱，还获得了丰收。老社員廖仁煥感慨地說：“过去爭水，亲人成冤家，如今抗旱，大家心連心，世道真是大变了。”

坪石村的社員們，終于战胜了历史上罕見的大旱，取得了丰收。社員廖千盛老两口，看到分得的八百多斤粮食，情不自禁地回忆对比了1942年的災荒情景。廖千盛激动地說：“要是在旧社会碰到这样的旱情，我这几根老骨头早就找不到了。”过去祖祖輩輩給地主做长工的廖同愧，在1942年遭災时，天天吃草根树叶；1963年秋收时，他家除去分得的現金和其他东西不算，单分回家的稻谷，每人就有三百七十斤。社員們在这大旱的日子里，想起解放前的苦难，看到今天的美好生活，就更加坚定走人民公社化的道路，更加热爱共产党和毛主席。

沙田泪

苏波口述

我是广东番禺人。我家的血泪史，是从地主无缘无故地在我家租耕的田里插了一面白旗开始的。

那年是1935年，我刚好八岁。家里租耕着黄编村“死地主”（祖尝）的四亩水田。一家五个劳动力——爷爷、祖母、叔叔和父亲、母亲，天天都象“田冬鸡”一样，从早到晚泡在田里，有谷子舍不得吃，有钱舍不得花，全部拿去歇耕本，买肥料，一心想把庄稼种好，希望得到两碗粥吃，不致饿死。

田里插上了白旗

这一年，算得天从人愿，田里的庄稼长得很好。快秋收了，爷爷领我到田里去，指着满田黄澄澄的谷穗对我说，割了这造禾，一定让我吃一顿香喷喷的干饭。说起吃饭，我们盼望了好久呵！几年来我们餐餐不是吃稀粥就是吃红薯或用木瓜心来充饥。爷爷说收割后可以吃到饭，怎不欢喜！谁知，就在这个时候，大祸降临了，一天，祖尝值理忽然在我们耕的田上插了一面白旗！

这是一面恐怖的白旗！它就象皇帝给臣子的赐死剑一样，插到谁家的租耕田上，那家人就要家破人亡！

原来，这里的祖尝值理为了随心所欲地鱼肉和剥削农民，

替“死地主”立下了許多“法規”，法規里面有一條：凡是被地主插上了白旗的土地，佃戶不得再在這田里耕耘，田里如有庄稼，一律不准拿動，全部收歸“死地主”所有。這一年，祖嘗值理認為我們的禾雖然長得好，但全部收成還不夠交租，於是便在我們租耕的田里，把白旗一插，不許我們割禾，不再租田給我們耕種了。

那天，爷爷听说我們的田里給插上了白旗，就象听到了死訊一樣，臉色登時煞白了，立即踉蹌踉蹌地奔至田里，望着那面恐怖的白旗，呆呆地站着，象失去了知觉似的。好久，大滴大滴的老泪，从眼眶里一行行地流下来。这打击太沉重了！我們仅有的一点微小的希望也破灭了！当爷爷顫抖着身子，拖着沉重的脚步回到家时，絕望地對我說：“地主心腸好毒呀！我們还有什么办法活下去呢！”說罢，双眼注視着我，过



了好一会才对我說：“你……你以后要听爸媽的話呀！”說完，便拿了一頂烂草帽奔了出去。我当时还未懂事，只是直楞楞地望着爷爷漸漸去远的背影。

几小时之后，村中的兄弟便仓皇地跑来告訴我們：“你爷爷投水自杀啦！”我們一家人立刻赶到河边，爷爷的尸首已被农民兄弟們撈起来了，只見他干癟的肚子脹得象个大冬瓜，眼睛流血……慘死了。

我們想把他抬回家哭喪，但地主說这不吉利，不准我們这样办。我們只好把爷爷的尸首停放在路边一棵榕树底下。晚上，他的一只眼睛和一只耳朵被老鼠咬掉了。可怜的爷爷，辛苦了一世，死后也得不到安葬。

爷爷死后不到半年，我的爸爸、祖母、四弟也相繼餓死了。地主的一面白旗，就杀死了我家四个人！

三弟的死

自从父亲死后，叔叔去替地主打长工，我和媽媽靠乞食度日。乞食怎能度日呵！媽媽說，她自己餓死就算了，可不忍眼看我們兄弟也餓死。她跟叔叔商量后，便把三弟卖給新南村一个名叫亚采的农民做养子，希望能救出一条生命。

亚采只有夫妻两人，沒有儿女，家里有两三亩田，最初日子还过得去。他們心地很善良，很同情我們，对三弟也百般疼爱。我們見三弟有了个飯碗端，不致餓死，心里也好过些了。岂料，好景不常。亚采家的田本来是一块草坦，經過他多年辛勤的圍垦，才变成了水田。这些田，沒有堤圍保护，潮水可以自由进出，稻谷产量极低；但土地是自己开垦的，不用交租，所以初时日子还过得去。誰知喪尽天良的地主逮

这样的几块田也不放过，要把它们抢过来。起先以所谓“护沙费”、“保护费”、“自卫费”、“草地税”、“牛头税”、“牙镰税”、“沙失税”等数不尽的名目，向亚采进行盘剥；后来索性在海边筑了一条堤，然后宣布堤内的所有田地都是他的。这样，亚采和其他农民用血汗开垦出来的水田，就被地主白白抢走了。从此，亚采一家的生活也没了着落，他不愿我三弟跟他一道受苦，便十分难过地把三弟送回给我们。

三弟又和我们一起行乞了。约莫沿门乞食了半年，三弟只剩得皮包骨。母亲已预感到这孩子救不活了，但寡妇孤儿，叫天不应，叫地不闻，有什么办法呢！果然，在一个严寒的黑夜，三弟不见回来了，后来我们去找寻，他已经饿死了。看见那情景就是铁汉子也要淌眼泪呵！他身上穿着一件破烂不堪的单衣，手上抓着一个烂钵头，尸首伏在地主家门口的石级上，一双深陷下去的眼睛，还饥饿地瞧着地主家紧闭着的大门呢！妈妈流着眼泪想去最后看看我弟弟，却又不敢走近去。因为怕被别人知道我们是三弟的亲属，要我们负责收殓，而我们也快要饿死了，那来钱收殓三弟呵！母亲木然地站在那里，手脚在颤抖，眼睛在流泪。天呀！一个母亲连死了的儿子也不敢去看一眼，去抚尸痛哭一场，世界上还有比这更悲惨的吗！

妈妈不敢走近三弟的尸旁，但是她又不肯离开。好久，她才对我说，她想知道弟弟被埋葬在什么地方。因此，她叫我到那地主家附近躲起来，看看有那一位“慈善家”把他收殓，埋到什么地方去。我听了妈妈的话，偷偷地躲到一个草垛里，睁大眼睛，紧紧地瞅着弟弟的尸体。又饿，又冷，又想妈妈，又可怜死去的弟弟，我当时真想放声大哭一场，可

是又怕被人发现，不敢哭。我在那里守了三日三夜，沒見有一个“慈善家”来收拾弟弟的尸体。我餓得实在耐不住了，便去沿門乞食。三天后我回到那里，弟弟的尸体已經不見了。不曉得是被狗咬了还是有人收拾了。

弟弟的慘死，給媽媽的剌激太大了，不久，媽媽便得了神經病。她逢人就发抖，双眼发青。

叔叔的关怀

媽媽患了神經病后，我們的处境更困难了，要不是我的叔叔救济提携，我們两兄弟也早餓死沟壑了。

我的叔叔是个心地十分善良的农民。自从我家遭到一連串的变故后，他变得更加沉实了。他为着扶养我們，下决心不結婚。这样过了几年，叔叔忽然辞掉了地主家的工，帶着几个朋友回家，一进门，也沒歇一歇，就忙着在四面墙壁挖了好些小窗眼。以后，常常有朋友来找他，有时还要逗留一天半天。他們对我很好，特别是那个姓吳的叔叔，更体贴我。日子长了，他們就开始叫我傳遞东西，多数是送一盒“万金油”，而且总是送到老地方去。我觉得很奇怪，一次，我好奇地把“万金油”盒打开来看，里面只有一片小紙条。我好生疑惑，回来問叔叔，为什么“万金油”盒里裝的不是万金油。叔叔說：“这是我們穷人要做的事情，你以后千万不要多說，地主知道了是要杀我們的头的！”

原来，我的叔叔这时已經参加革命了，他时常帶回来的朋友就是游击队员。那个最体贴我的吳叔叔，就是一位司令員。

以后，叔叔对我的关怀不单是生活方面的，一有空閑，

他就給我講一些革命道理；我當時還聽不明白，但我覺得，叔叔是一個有見識的人，所以我更加愛他了。可是，當我越來越感到離不開叔叔的時候，叔叔卻被敵人殺害了。當時，他和六個同志外出活動，遭到地主何健武裝的突然襲擊，六個同志當場犧牲了，叔叔在打死何健的幾個狗腿子以後，也被他們抓住了。何健把他囚在一個戒備森嚴的院子裏，進行嚴刑拷打，要他供出游擊隊的情況，但他一句話也沒有說。在臨犧牲前的一天，他托何健家裏的一個長工把我悄悄地帶到他那裏。叔叔滿身都是傷痕和血跡，躺在地上，見我進來，勉強掙扎起來，把我拉到身邊，用他那雙火一般燙人的手撫着我。我看見叔叔被打成這個樣子，一陣心酸，幾顆淚珠正好滴在叔叔的手上。叔叔把我的頭扶起來，叫我不哭，要挺直腰板做人。他還對我說，“我落在敵人的手裏，沒有活的希望了！你要記着我們一家的仇恨，長大了，要報仇雪恨呀！……”

第二天，叔叔便壯烈犧牲了。從此，我和游擊隊的同志也失掉了聯繫，繼續和媽媽、弟弟在黑暗的社会里熬着苦日子。我多麼盼望游擊隊的同志再回來啊！

終於，我們盼到了這一天：1949年9月1日，解放軍來到我們的家鄉，我們獲得解放了。我的一家從此永遠結束了托鉢沿門乞食、受人凌辱的非人生活。隨着農業集體化，生產發展了，我們農民的日子一天比一天美好了。解放前，我家十口人餓死了七口；解放到現在，我家已由三口人增加到八口了。1962年收入達到二千九百元，糧和錢都吃用不完，並且還有一千多元存在信用社裏。媽媽的神經病早治好了。在黨的培養下，我還被選為生產隊長。每當夜闌人靜，我想起

从前漫长的凄惶岁月，想起爷爷、爸爸和叔叔的死难，我就加倍地感到生活在毛主席时代的幸福，同时产生出一种建设社会主义的无穷力量。

(吴礼彭、区平整理)

虎口余生

楊 濤

在福建尤溪梅仙公社楊梅坪的高山上，我訪問了一位名叫蕭祥鎬的老人。他今年六十岁，从二十九岁起，两腿就瘫痪了。在那吃人的旧社会，劳动人民两腿殘廢就意味着死亡。但他不甘心死，他要斗争。在地主、高利貸商人的殘酷逼迫下，他咬牙忍受疾病的折磨，爬着滾着上山开荒，种植了許多油茶、油桐、杉木和粮食作物。一年、两年，粮食打下了；五年、十年，林木长成了。蕭祥鎬的境遇又是怎么样呢？他逃得了高租，也逃不掉重利；逃出了地主的血手，又掉进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魔掌。十多年血泪創業，到头来还只留下一身債据。解放以后，他翻了身，农业集体化以后，他一家的日子好过了，可是，蕭祥鎬老人并不满足于这些，他的眼光看得更远，他依然用凳子代腿，帶領着子女和社員們一道翻山越岭，以愚公移山的精神发奋劳动，誰也劝阻不住他。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意志啊？这种意志是怎样产生的？說起这，話就长了……

屋漏偏遭連夜雨

1932年，当蕭祥鎬二十九岁的时候，他父亲病死了，母亲已經五十多岁，老婆是个多病的女人，大儿子六岁，小儿子

才周岁，全家老少的生活重担落在他的肩膀上。当时，他家租种梅营乡地主詹鹏廷十来亩水田，每年还得要交二十三担租谷，只靠他一人没日没夜的操劳，不多久便累出了重病，因为无钱请医生治疗，结果两条腿都瘫痪了，只能躺在床上，连坐起来都不可能。

萧祥镐一躺倒，家里的生活怎么办呢？他打算先请一、二个亲戚朋友帮忙把地种上。可是，正在这时，地主詹鹏廷的弟弟詹鹏光来到他家里，气势汹汹地说：“我的地你明年不能耕了！”萧祥镐一怔，说道：“你那些地，我祖祖辈辈耕下来，花了不知多少血汗，才收拾成现在这样子，如今我脚不好，你就要抽回去，这怎么讲得过去呢？”萧祥镐的母亲在一边恳求道：“你把地抽回去，我一家子老老小小怎么过呢？”詹鹏光登时吼道：“你一家饿死我也不管！田一定要抽！”说罢，回身跨出房门。过后，詹鹏廷就用一根竹竿串着三张草纸往田头一插，这意思就是说，老佃户再不能到这些土地上去。萧祥镐气极了，真想跟狠心的地主拼命，可是，当他从床上一坐起来，就又支撑不住倒下去了。土地叫地主抽去了，眼看快断炊了，怎么办呢？

在那风雨交加的日子里，他们只好伸手向人家借债、求乞了。可是，有钱的财主谁又肯把粮食借给他呢？梅营乡有一个高利贷商人，本来说好以一担二斗谷子同萧祥镐换三十根杉木，但当他的老婆去到商人家里挑谷子时，那商人却摇头说：“不，我不要你的木头了，不合算，我把一担二斗谷子拿去放利，一二得二，二二得四，一年净收二担四呢！”她虽然生气，但仍求情道：“那你就把一担二斗谷子借给我们吧，往后还给你二担四！”那商人冷笑道：“嘿，你男人没有脚，

包餓死的，谷子借給你，還能拿兩隻爛腳還給我呀？”這一句刻毒話，使她氣的說不出話來。

這時，苦難的家庭重擔完全落在蕭祥鎬的老婆身上，一些有錢人又在他老婆身上打主意。一天，從十八都潘坑來了兩個人，你一言我一語地對蕭祥鎬的老婆說，你男人沒有腳，有什麼可以圖的？你天天討飯吃，能過日子嗎？你才二十來歲，如果願意，担保能找一個吃好穿好的人家……。他老婆十分生氣，把他們頂回去了。蕭祥鎬知道這事後，心如刀割。他老婆堅定地安慰他說：“你放心吧，我怎麼忍心離開你們呢？”蕭祥鎬哽咽着發憤道：“只要我蕭祥鎬還有一口氣，我還要用鋤頭、柴刀來干活，不能眼睜睜的讓你們都餓死！”

千辛萬苦掙活命

1936年，蕭祥鎬能夠起床了，可兩腿還是癱瘓的，不能動步。他只得用兩手支着兩條板凳，俯着身子，靠手和上身的力，把身體和兩隻腳往前拖，這樣移動幾步，就會累出一身大汗。儘管如此，蕭祥鎬每天都堅持練，從早到晚，極少休息，直練到兩眼發黑，精疲力竭。當他母親勸他休息時，或者他自己有些灰心時，他腦海里立即就會閃過地主和高利貸商人的猙獰嘴臉，這樣就又繼續頑強地練。幾個月以後，漸漸習慣了，他就開始開荒種油茶。他借來了鋤頭、劈刀，叫他十歲的大兒子替他扛到山上。然後，他自己支着凳子和拐杖，一步一步換到山上去。最初，他是左手抓住凳子，支着身體，右手揮動劈刀劈草，雖然能劈一點，可是，十分費勁，一會兒就提不起劈刀了，茅草、灌木都砍不斷，辛苦了半天，劈開的土地還沒一張桌子面寬。後來，他自己做了一

張一尺多高的长凳子，叫他儿子搬到山上，他坐在凳子上用双手劈草、鋤地，这样就快多了。但是，斜坡上凳子放不平稳，怎么办呢？他又做了一张一头有腿一头沒有腿的长凳子，沒有腿的一头靠在山上的斜面上，凳板就平稳了。油茶播种的时候，他又自己編了一只竹篮子，装上种子挂在腰上，移一步撒一顆。……就这样，每天早出晚归，冒着烈日、風雨、严寒，頑强地开山垦荒。冬天，他在凳子上挂着一只火籠，手冻僵了，烘一烘，又繼續干。有时，一整天才鋤一小块地，开一条短短的水沟。过去只要他揮起鋤头，不用一、两个钟头就干完了，現在，要干上两、三天！他整整辛勤地劳动了十二个月，才在住屋附近的山坡上开出了一亩半土地，播上了几百顆油茶籽，間种了二千多株番薯。一亩半地虽然很小，可是，蕭祥鎬为这土地却不知付出了多



少汗水，多少血泪啊！不，这还不是最主要的，他想，最主要的是：他已經有了自己的土地，不用再向地主詹鵬廷乞求了！不用再向梅营放高利貸的人乞求了！他兴奋地想，“你們要叫我蕭祥鎬餓死，好吧，我現在就干給你們看看！”第二年、第三年、第四年，他又繼續在附近开垦出几亩荒山来，种上了油茶、油桐和番薯。

1940年以后，蕭祥鎬开始到外村的荒山上去垦荒。这些荒山有的距离七、八里，有的十五、六里。从楊梅坪到園竹山，不光要走十几里崎嶇的山路，而且有一条很长很陡的山崗。蕭祥鎬依然是左手拄着拐杖，右手支着一張凳子，半俯着身子一步一步往前移动。这一条路，人們只需要走一个多钟头，而他至少要花一天半時間。一天赶不到園竹山，晚上，他就把棕衣鋪在路边，倒在大树下睡觉。有时遇到大雨，也只好坐着任凭風吹雨打。这些都不算什么，而最危險的是下那陡峭的山崗。在那狭窄崎嶇的石阶路上，要找到一个放穩凳子的地方，是多么不容易啊！一不小心，凳子翻了，他就头朝下順着石阶栽下去，跌得滿头鮮血淋淋，凳子和拐杖都拋得老远。但是，他頑强地坚持下来了。

旧世道比虎更凶

从1936年到1949年的十四年中，蕭祥鎬先后和他儿子在梅仙附近的正俞、俞头、后东坑、蛤竹山、園竹山、牛不肚、八都山等地栽种了油茶、油桐七千多株，杉木一千多株，开垦山田二十多亩。他的家业，可以說是用血泪和汗水創立起来的。然而，他并不能逃出剝削階級的魔掌，仍旧在殘酷的階級剝削和压榨下度着悲慘的生活。

有一回，蕭祥鎬在高山上海番薯，忽然，山头出現一只大老虎吼叫着朝他走来，山下許多人都吓得四处奔逃，他沒法逃跑，只得握住劈刀，准备和老虎决一死战。幸亏老虎沒有发现草丛里有人，回头走了。后来，有人对蕭祥鎬說：“你是老虎嘴巴里掉出来的人啊！”他苦笑着道：“我如今还在老虎嘴巴里过日子哩！”可不是嗎？旧世道比老虎凶殘得多了，要躲避都躲避不了呵！

最初几年，他刚刚开始垦荒，收成不多，每年不能不仍靠借貸过活；以后几年，虽然土地多了，林木多了，可是，由于路远、力弱、土瘦、肥少，只能輪种一部分土地，收成也不高，林木也不可能很細致地撫育管理，收入也有限。而十几年积下的債務，却比以前多得多了，每年辛辛苦苦收下的谷子、油茶都要先挑到梅仙、梅营和八都去还債，稍迟几天，債主就逼上門来。这样，吃的穿的又得另借新債。那些高利貸剝削者，又乘机抬高利率，任意敲詐剝削。有一回，蕭祥鎬的老婆去向一个富农借粮食。那富农最初說沒有粮食借，她再三恳求以后，那富农說：“粮食是有，就是怕你嫌利息重。”她問：“多少？”富农說：“一斗还一担！”这是什么样的利率呵！可是，为了活命，不借又吃什么呢？她心里罵着这个狠心的富农，还是不得不咬着牙根借了一斗粮食……。年复一年，旧債加新債，利上再滾利，高利貸把他压得几乎喘不过气来。加上国民党官府的苛捐杂稅，横征暴斂，尽管春夏秋冬，他櫛風沐雨地支着凳子、拄着手杖，拖着殘廢的身体，翻山越岭去耕种，到头来仍旧不得温飽。1941年天旱，几乎沒有有什么收成，蕭祥鎬辛苦一年收下的几担谷子全部挑去还債、納稅还不够，家里已經断了炊，全家老小吃草根度

日子，他自己也只好吃草根在正命山上开荒种地。一直到解放那年秋后，蕭祥鎬虽然苦掙扎了这么多年，虽然年年在还債，但是依然还欠人家十几担谷子，越还債越多了，这样的重債，对于这个两腿瘫痪的农民，要不是解放了，到什么时候也还不清呵！

党的恩情海样深

解放了，土改了，蕭祥鎬翻身了。人民政府照顾蕭祥鎬，选择了距他家較近的、較好的十三亩土地分配給他，并为他除去了一部分不合理的旧債，使他很快就偿清了十几年积压下来的債務，这才真正結束了他的悲惨的生活。1956年，楊梅坪掀起合作化高潮的时候，蕭祥鎬立即将自己用血泪开垦出来的和土改分到的四十多亩土地，以及近万株油茶、油桐、杉木，入了高級社。入社后，集体生产发展了，他的两个儿子都长大結婚了，家里有了四个主要劳动力，生活过得更好了。不要說家里添置了許多棉衣、毛衣、卫生衣、热水瓶、球鞋等等，三十年前他父亲沒有盖完的房子也逐漸盖起来了。有人劝蕭祥鎬說：“你苦了一輩子，該在家里抱孙子享福啦！”可是，他沒有这样做。解放前，他血泪創業十几年，仍然一身債；如今党领导全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又走上了集体化的道路，从此，劳动才有了真正的收获。他明白，只有在集体力量的支持下，才能創立真正的家业，劳动人民要彻底刨掉穷根，永不让过去的苦日子再回头，就必须繼續发奋劳动，发展集体生产。因此，他还是經常支着凳子、拄着手杖上山去种植和撫育油茶，生产杂粮，一直保持着热爱劳动的本色和艰苦奋斗的精神。虽然，从互助組、合作社到人

民公社，集体都非常关心他，沒有把他作为一个劳动力安排农活，但他怎么也閑不住，总是自觉地参加劳动，有一回，梅营大队党支部书记特地对他說：“祥鎬伯，你年紀大了，脚又不能走，不要上山了，你就在家里做点什么吧！”而他却笑笑說：“哎呀，过去那样的日子都苦过来了，現在这样做一点，算得什么呀！”他对集体的油茶林，尤其是他自己种植的油茶林，有着深厚的感情。虽然集体已經安排人去撫育管理了，但他还是經常要去鋤鋤草、松松土。有人对他說：“祥鎬伯，那地有人会去鋤的！”他說：“嗨，誰鋤还不一样？管油茶要管得細，并且不能誤季节，俗話說，七月挖金，八月挖銀呵！”集体有时要补給他工分，他也不要。据統計，解放后他在正命、白梅、树头等地新栽的油茶、油桐就有二千多株，并在大峽山开山劈草十一亩，准备繼續种油茶一千多株、間种油桐一千多株；此外，在楊梅坪大隔还开垦水田十多丘。他不但經常上山劳动，即使在家里的時候，也閑不住。他有一手編竹器的好手艺，他編制的竹器有米籬、米篩、簸箕、竹箕、竹籃、竹筐、火籠、鸡籠、番薯扁、草耙、土箕、菜盖、斗笠等三十二个品种，一年要生产二三百件。現在，楊梅坪生产队和附近一些生产队所用的竹器中，有許多就是出自他的双手。

我到楊梅坪生产队时，正逢油茶开花的季节，銀花遍野，滿山皆白，对着这一派繁华盛景，我自然而然地会把它同蕭祥鎬的勤奮形象联系了起来。今天的蕭祥鎬老人滿面笑容，精神矍鑠。我見他那張帮助走路的凳子上滿是疤痕，不禁問道：“你这扶手的凳子用了多年了吧？”他笑道：“同志，解放前十几年，我翻山越岭用坏了三十張这样的凳子哩！”三十張

凳子，这包含着多少血泪，多少辛酸啊！接着，他就向我谈起了目前他家里的情况。他说：“我如今一家十四口人，大儿子和两个媳妇在队里劳动，二儿子是队里的会计，全家人吃的、穿的、用的都宽裕，没有党和毛主席，没有公社，我萧祥镐一家会有今天的日子吗？”说完，他爽朗地高声大笑了起来。是啊，一个过去倍受剥削压迫的残废老山农，如今翻身作了主人，并且继续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着力量，他有着怎样幸福和自豪的感情呵！看，他一身都焕发出了扬眉吐气的神采！

六亲不认

何瑞泉口述

我是山西洪洞县板塌村的人，我父亲有个姑舅表兄，名叫郭廷良，也是板塌村的。解放前郭廷良一家十三口人，占有耕地四百二十亩，是洪洞县有名的大地主。父亲十三岁时，郭廷良把父亲叫到他家，“亲热”地拍着肩膀说：“来吧，咱弟兄还分什么你我，只要你好好干，表兄我亏不了你。”

父亲当时很受感动，心想：这一辈子运气不赖，遇了这么个好亲戚，有了铁饭碗啦！于是，一年四季，给地主耕种、收割、喂牲口……，不论重活轻活，不分黑夜白天，使气出力地干了二十一年。父亲三十四岁那年，郭廷良的两个儿子郭辅唐和郭佐唐闹分家，他们都怕父亲要工钱，在分家时对父亲说了许多不好听的话，父亲看透了“财主”的心，只说了一句话：“看我离了你郭家能活不能活！”扛起铺盖卷就走了。整整二十一年，没拿一个工钱，离开了郭家。

父亲身体好，有力气，就给人打短工，母亲日夜纺花织布，不敢稍停。全家人勤劳生产，省吃俭用，好不容易用积下的几个钱，陆续买下四亩二分地。父亲却因挨冻受饿，劳累过度，五十五岁上就去世了。父亲临死的时候，把母亲和我叫到跟前，泣不成声地说：“我……我总算对起……你母子了。……地……地是庄稼人的命，千万要……要把地守住啊……”

“天呀，这可叫人咋过活呀！”父亲一死，母亲哭得死去活来。那时我才十四岁，含着满眶眼泪，搖着媽的肩膀：“媽，你……你不要哭啦，我……我养活你。”媽突然把我摟到怀里，嗚嗚咽咽，哭得更痛心了：“我娃还小哩，頂不住呵！你不知道，財主……財主的心比蝎子还毒哩……”

孤儿寡妇的，媽老怕財主暗算，一想起父亲就哭。

1932年，大禍终于临头了。

郭輔唐看中了我家的地，又听说我十八岁了还没訂婚，打着“关照”亲戚的幌子，找上了門，对着我媽，試探地說：“表孀，这几年你鬧得不錯呀，也该給表弟娶个媳妇了。”

“你表叔死后的債，今年才还清，那有余錢討媳妇？緩緩气，往后再說吧。”

郭輔唐知道俺家底細，“亲热”地对我媽說，“別多心，要用个錢，就說話，給旁人借不借，还能沒你借的。”

家里这时缺錢，媽正打算借債，經郭輔唐一說，正合了她的心意。她想：借就借点吧，不过是迟还几天，騙不了他。好坏是个亲戚哩，他还能逼債？终于說：

“可是，借了你的錢，咋还呀？”

郭輔唐越发“亲密”起来，非常“大方”地說：“甭怕，啥时有了啥时还。別人借錢，一律押‘紅契’，你借，就不押了，別人是三个月本利还清，你是一年。一件好事嘛，侄儿还能不成全成全。”

母亲一时被感动得几乎流下泪，觉得还是“亲戚”，旁人誰替咱操这心、出这力呢？便說：“好，就借給我七十五元吧，办了事，想法子还你。”

这件事，正中丁郭輔唐的心意。拿錢那天，郭輔唐找人



写了白紙借約，还說了許多人情話，“給我留下个执把，往后还不还，总知道有过这么回事。”

那时，咱这里十年九災，苛捐杂稅又多，莫說咱这穷家，比咱强几倍的，一年也余不下几个錢。眼看还債日期到了，家里却連买盐的錢也沒有。第二年秋后，郭輔唐討賬来了：“表嬸，一年零三天了，哪錢……准备好了吧？”

“唉，今年收成不好，你……”

沒等媽說完，郭輔唐又开了口“哎，咱不能过了河拆桥嘛！当初說的明白，一年！期限到了就該还，一时不便，也該想法子，活人总不能让屎尿憋死呀！”

一听这话，媽的臉色变了。她的嘴唇动了几动，却没有說出话来。她知道郭輔唐話里的意思，心想拿“表嬸”的身分，求求郭輔唐，再寬限寬限。可是一看郭輔唐气恼恼的臉，她

沒有敢說，該人家的還不了，有什麼法子呢？無奈，把“斜道里”一亩六分上等水地的契約遞給了郭輔唐。

“要是旁人，這點地就頂不了那麼多錢。”郭輔唐說着爽好的話，拿上“紅契”揚長而去。

“怪不得人罵郭輔唐是活閻王，真的是個殺人不見血的活閻王！”母親認准郭輔唐不是好人，決心不再和郭輔唐打交道了。可是，她哪裡知道，天下烏鴉一般黑，財主都是吃人的豺狼呢！

又過了一年，到1934年，我正好二十歲了。媒人幾次催我母親叫娶親。母親干着急，沒辦法，哭了一次又一次，給我說：“你這媳婦搬不過，我死也合不上眼。”

正在這時，郭輔唐的弟弟郭佐唐來了，這人裝得可綿善哩，一進門就笑：“哈哈，表嬸呀！你這大年紀啦，表弟也不小啦，給娃把親搬過來，一樁心事就了結啦。”

媽想，世界上還能盡是狼心狗肺的人？佐唐說話面帶笑，決不是輔唐那号人。便說：“要一文，沒一文，拿什麼搬親呢？”

“用多少你說話嘛！”郭佐唐興奮地站起來，準備回去。走到門檻，回過頭來，又殷勤地對我媽說：“哈哈，表嬸，什麼時候用，就來拿，嗯！”

我媽又“得救”了，她眉開眼笑地找媒人，走親戚，張羅着給我娶媳婦。一天，媽去找郭佐唐，想把要借的錢拿回來，準備到時好送彩禮。郭佐唐當時沒給，答應得倒挺大方：“該準備什麼你先準備着。錢便當，不過你最好甯拿。時世太亂，你的院子又野，半夜有人來打劫，多危險？我家有盒子槍，人手也多，保險。放到我櫃子里，還不和在你櫃子里一樣？”

送礼的时候再拿吧，嗯？”

媽觉得人家佐唐的話在理，是真心幫人。点点头，滿意地回来了。

娶亲的日子到了，媒人和两家亲朋請来了。吃过酒席，按当时旧习俗，就要当面点送彩礼。可是事到眼前，手里一块錢也沒有。开席前，媽又去請郭佐唐，請他带上答应借給的錢，来吃酒席。不料，这回郭佐唐偏偏不来。借錢的事，他只字不提，却諛諛着說：“招呼客人去吧，我今天沒工夫。咱是自己人，得罪不了。嗯！去吧，招呼人家去吧！”

“我是說……”母亲正說借錢的話，郭佐唐急忙“客气”地把她推出来了。

送礼的酒席吃完了，郭佐唐还是請不来。郭佐唐不来，沒有錢，礼送不成，亲就不能搬。媽急得团团轉，不时用袖子擦眼泪。这如何是好呢？媽想，要是当初不听郭佐唐的話，暂时不請媒人不送礼，再过个一年二年，寬裕些了再搬亲，也省得“坐火鏊”。如今騎虎难下，不光丢人敗兴，媳妇也有吹了的危險。

姐夫看不过，他以亲戚身分去找郭佐唐。郭佐唐哭丧着臉說，“咱家也是一时不便呀！原先估計到这时錢就回来了，誰知道那些穷鬼們不还，唉，真是气人！”郭佐唐見姐夫沒吭气，又說，“这么办吧，我找別人‘轉’去。咱有这个破家，就是‘轉’，也比她好办些，十有九成能借到。不过……不过，咱这里的規矩，你全知道……我总不能押上自己的地，去給旁人借錢呀！”

啊！窗戶紙終於戳破了。原来，郭佐唐也是看上我家仅剩下的那块好地了。

姐夫回来一說，媽哭了，我哭了，不象請客送禮，倒象是死了人。我說：“媽，算了，咱不搬媳婦啦！”

这时，郭佐唐来了。臉色还是很綿善，“怎么办？快定一下，我还有事哩！”說完扭身就要走。媽赶快央求人家，“搬了媳婦，加了人，沒有地种，可叫我这一家咋过呀！你……”郭佐唐很自然地接上了話茬，“唉，看你这人心眼多死！人常說：‘田地房屋轉百主’哩。現在用錢，卖了；过后有了錢，还能置嘛！再說，咱家几百亩地哩，还怕沒你种的！”

越来越明显了，原来，郭佐唐是想叫我們世世代代給他家当佃戶、扛长活呢。

媽想一陣，哭一陣，总觉得我的亲事要紧，无論如何不能把亲事打了退堂鼓。她終于用顫抖的嗓音对郭佐唐說，“好吧，你拿錢去吧！”把仅有的“娘娘庙”二亩六分头等水地，作为抵押，按“借八还十，四分息”，請郭佐唐“轉借”了八十块銀元。

不用問，第二年郭佐唐按“章”夺了地。

娶了媳婦蕩了产，哭不得，笑不得。我媳婦回了娘家，俺母子俩哭了不知多少回。媽哭得最伤心。口口声声說，“我对不起你爹，我……”

可郭佐唐还是“慈善”地对媽說：“不要怕，那二亩六分地，你还种着。反正別人怎样你也怎样，还能亏了你。”

有什么法子呢？庄稼人沒了地，怎活？只好接受下来，繼續种。租子是“加二五”的大斗，一亩地一年一石。从此，“子承父业”，我也給財主当开牛馬了。

租种地主的地，可不比种自家的地。遇到好收成，还能吃个三斗二斗，遇到旱涝災害，就更倒霉了。我“租”地头一

年，就遭了涝灾，秋庄稼收得很不好，盆盆罐罐都集凑上，只盘了两石二斗。狗腿子刘三元，把斗敲得当当响，叫着，“装，装！”郭佐唐不哼不哈，站在一旁斜瞅天。看着快装完了，妈含着泪又央告人家：“实在沒有了。差下的四斗，明年秋季一齐交吧……”

人說“穷汉吃得亏”。吃不得亏又有什么法子呢？日日夜夜，好容易盼的收了秋，家里却沒一顆粮。吃糠咽菜地备足底肥，把小麦种上，我就去担挑糊口。

第二年春天，小麦返青拔节、吐穗、揚花，长得很好。我想，今年夏季有个奔头，我妈和我媳妇，嘴角上也露出了笑容。“芒种”前，我又去串担，回来路过地边，看见我种的麦已經收割完了，佃农李长荣正在放水浇灌，准备种回茬玉菱。

“这是咋回事？”我很奇怪，一时竟有些晕头轉向了，把眼睛揉了揉，看看左右地邻，看看地头的渠、路……沒錯，就是我的地。

李长荣抬头，见我楞在地边，很难过地說：“你回来了？这块地，郭佐唐轉租給……”

不好！我脑子里“轰”地一声，眼睛都发黑了。昏昏沉沉回到家里，把担子摔在門口，一头倒在炕上。妈見了我，哭得說不成話，“你……你不在，人家把……把麦收了，把地也……也夺了！”

“天哪！这不是活活害我一家人死嗎？”三口人都把眼哭紅了，哭肿了。

这时，东山里有家穷亲戚来了，說我这样一直在家里，会愁出病来的，劝我上山另想办法。1936年秋天，我带着母

亲和妻子，上了东山，一直到1946年土地改革，穷人扬眉吐气的时候，我才又回到板场村。我和从前的那一伙穷弟兄们，都分了土地分了房，以前愁眉苦脸的佃农和贫农，都乐滋滋，喜洋洋的，生产劲头可大啦！

通过土地改革，我明白了一条真理：不论说到哪里，还是咱们阶级弟兄亲，党和毛主席亲！只要还有阶级和阶级斗争，咱们就不能模糊阶级界限。

（中共洪洞县委中心通讯组整理）

揭开“族长”的画皮

車秀娥口述

我的老家在浙江上虞县車祖堂，那里几百户人家都姓車。听我父亲說，他年輕的时候，族长是車太公。車太公几代都是大地主，脑后留一条小辮子。逢时逢节开祠堂門，他总是拄了一根龙头拐杖，左拥右簇地出来。人人見了他，都得弯腰向他磕头。稍不如意，他要罵就罵，要打就打，誰也不得違抗。有一次，为了輪种四亩祭祀田，我的大爷爷（我父亲的大伯父）当面回了嘴，車太公就将他毒打了一頓。那时大爷爷是一个血气方剛的男子汉，受不了这场屈辱，可是又反抗不得，只好每天借酒澆愁，竟成了瘋子，不久就死了。大爷爷一死，我的太娘娘（我的曾祖母）一气之下也得了精神病。家里无法呆下去，爷爷就打发父亲离开車祖堂。但又沒有盘川出門，爷爷沒办法，就去向族长求借。狠心的車太公乘机霸占了我們的两間房子。我父亲单身一人逃到了上海。

过了几十年，“一·二八”战事爆发，我已九岁了。那时候，我家里共有六口人。父亲在煤炭店里当伙計，母亲是搖袜厂工人，靠他們两人微薄的收入，那能养得活这一家呢？正巧那年母亲又生下第五个妹妹，父亲急得走投无路，只得把一家人带回上虞县車祖堂老家。这时候，爷爷、娘娘已經离开人世了，那杀人不用刀的車太公也死了。这“族长”就輪

到了車太公的儿子車复旦，人称“堂房大爷爷”。車复旦在乡下有几百亩良田，在县城里开了一爿米行。他祖上霸占我家的两间屋给了他儿子“阿贵店王”（“店王”就是“老板”）的小老婆住了。我們回来就住在阿贵店王的贴隔壁，正是狭路相逢。阿贵見我們一家人回乡，非常恼恨。沒几天，“堂房大爷爷”就把我的父亲叫去，冷冷地問道：“你那女人是从哪里搞来的呀？”父亲說：“我們在上海正式結婚的。”他一听，一声冷笑，說：“那你就得按規矩办事囉！”接着又是一陣“嘿嘿嘿”地干笑。父亲知道族里的規矩是男人結婚，女人生头生孩子都要办酒祭祖，不办酒就不能上“家譜”，以后女人就得給人罵“北佬女人”，孩子也要給众人罵“盜生”（野种）。那时候，我家穷得連飯也吃不上，那有錢办酒呢？我父亲只好把心一橫：“让人家罵我的老婆和孩子吧！”那年大年初一开祠堂，按族里規定，亲生子女“吊紅綫”，領来的子女“吊藍綫”。我們一家人，除了我父亲以外，因为沒有办过酒，紅綫、藍綫都沒吊，都是“野种”，进不得祠堂。父亲怕我出去闖禍，不許我出門。我年幼无知，等父亲一走，就溜出去看熱鬧。只見車复旦长袍馬褂，手里握一根“文明棍”，带着一群人大搖大摆地走过来。我看得呆了，一时来不及躲开，也忘記叫“大爷爷”。他举起“文明棍”，在我額头上一点，向左右問道：“这是誰家的后代？”站在我旁边的人連忙打恭作揖地回答說：“是学勤的因儿。”我知道要闖禍了，急忙逃回家来。父亲从祠堂回到家，一进門，見我就打，罵我不长志气，害得他給族长臭罵一頓。父亲打我罵我都不怨，但他在祠堂里受辱，我可不愿。我放开喉嚨喊道：“誰要不給人家看，就从天上飞过去！”不料这一喊，給隔壁車复旦的儿子“阿贵店王”听去了，

又惹出一場禍來。隔一天，車復旦又要開祠堂，把我父親拖到祠堂里，罵道：“只會養，不會教，敗家子孫。”定要把我父親趕出車祖堂。在大家求情之下，車復旦才沒把我們一家趕出村，可是，我父親還是挨了一頓毒打。他挨打回來，不罵我，也不打我，只對我母女兩人流淚。他對我們說：“族長、祠堂、家譜都是假的，只有鈔票是真的！”

雖然在車祖堂住下來了，可是日子也真不好過。母親剪點花樣出去賣賣，父親帶着我們討飯，另外種了四畝祭祀田。每天燒一點面糊糊、粥湯，里面放了許多野菜，一人分一碗，有時分不過來，父親和母親只好吃點“雞爪糖”，吃下去拉不出屎，有時拉出血來。

一天，我和父親在外面討飯回來，我的妹妹突然臉色慘白，手脚抽搐，不知生的什麼病。我們都很着急，可就是沒有錢給她看病，只好弄點艾葉在她周身擦擦，眼睜睜地看她痛苦地死去了。

我家一沒有農具，二沒有肥料，又不懂農事，秧苗長得又黃又矮。還沒到成熟的時候，我們就去捋稻谷來充飢。等到稻谷成熟，已經所剩無幾了，連繳“錢糧”（田賦）也不夠。由於繳不出錢糧，父親被偽縣政府捉去吃官司了。母親和我急得到處奔走，想湊些錢把父親救出來，二妹當時也不在家，家里只留下一個弟弟照顧最小的妹妹。誰知錢湊不起，等到我們回家，妹妹卻已經餓得只剩一口氣了。我們馬上把身邊半塊硬糕摸出來，用水濕一濕喂給她吃。妹妹餓極了，拚命地吃，一餓一飽，不出兩天，就死了。

隔幾天，父親忽然回家了。我們全家都很高興。可是父親對我們說：“這次放出來是叫我想辦法的，三天內繳不出錢



粮，还得要捉进去。”这一说，又急得全家哭哭啼啼。就在这个时候，“大爷爷”车复旦来了。我们想，恳求他帮个忙，就用不着吃官司了。我们恭恭敬敬地迎他进屋，谁知刚请他坐下，他就冷冷地问我父亲说：“学勤，几时做斋饭？”种祭祀田的人家除了缴钱粮以外，都得办斋饭，来吃斋饭的同族人都随身带秤来的，规定红烧肉十二两，白斩鸡十二两，老酒尽吃等等，不足分量的，田就不给种。父亲忙说：“大爷爷，我钱粮也缴不出，这斋饭……”他不等父亲的话说完，就站起来，打了我父亲两记耳光，并且骂道：“末代子孙，活在世上圪车家祖宗的台。”那天晚上，一家哭哭啼啼，只有父亲一声不响，等到大家睡着了，他却站起来，走到灶头前，倒了一碗盐卤一饮而尽。正当他要喝第二碗的时候，我惊醒了，

連忙奔过去夺那碗盐卤。全家人都吵醒了，父亲才放下盐卤，摸着我的头，看着我母亲，哽咽着說：“不是我丢下你們娘儿不管，实在……”下面的話他說不下去了。父亲的性命是救下来了，但是从此就得了一身重病。他整天地咳嗽，鮮血一口一口地吐出来，不久，人瘦得象个皮包骨。在腊月二十的那天，父亲病得只剩下一口气了。母亲想弄点东西給他吃。家里无柴无米，母亲就叫我去討点东西来，她自己出去弄点柴来。父亲見我們弄来这些东西，生气了，張着哑嗓子喊道：“我是将要死的人，还顾我做啥！”說完，一脚把一只脚炉踢下床来。誰知那脚炉正巧打在我九岁的妹妹头上，她一惊，也得了病。只見她牙齿咬得紧紧的，滴水不进。第三天，她就死了。父亲的心碎了。他一把抓住我母亲的手，顫声說：“大伯伯为了这块祭祀田給族长打死了。孩子娘，你要告訴孩子，我是怎样死的，叫孩子們永远不要忘記……”他的話沒有說完，手一松就断了气；可是他两只眼睛还是張得大大的，含着两眶眼泪。这一天是小年夜，家家户户都在过年，我家連死了两个人，母亲哭得死去活来。邻里們都来劝她，說：“把爷因两人弄出去要紧，哭坏了身体怎么办呀！”可是，那里来的錢买棺材呢？有人說：“振康米行老板不是你家族长嗎？总是自族人嘛。求求他帮一把，将来孩子大了，再报答他也不迟。”母亲一听，心里象針刺一样。这个杀人不用刀的族长还有什么亲不亲，族不族的？继而一想，人也死了，也許能使他良心发现。于是，母亲硬着头皮出去求借。

老虎是不会发善心的。母亲到振康米行的族长那里去求借，“大爷爷”听了母亲一番苦情，表面上装着一副“慈悲”的样子，說：“这样吧，你那两間房子，四亩祭祀田……”母亲

一听什么都明白了。車复旦不光是看中我們两間破房子，而且还要千方百計把我們一家趕出車祖堂啊！母亲发誓：宁可餓死，也不把房屋、田产賣給仇人。她轉身就走。可是，到哪里去呢？回家嗎？两个死的要葬；跳到河里去嗎？两个活的要吃。真是进退两难啊！母亲在雪地里徘徊了一整天，直到太阳落山的时候才回到家。亏得邻舍木匠伯伯的帮助，把家里的一堂板壁拆下来，釘了大小两口棺材。

車复旦还是不肯放过我們。隔天，他就派人来阻止我們出喪。說什么“出喪要办齋飯；不办齋飯，棺材不可拿出去。这是族里的規矩。”怎么办呢？邻居們来劝我娘說，还是来个“偷喪”出，等天黑大家帮个忙抬出去算了。我母亲想，自己結婚沒有办酒，給人家罵“北佬女人”；孩子出生沒有办酒，給人家罵“盜生”；今天男人死了，又沒有办齋飯，将来又要給人家罵“偷喪”出。这，上对不起死人，下对不起儿孙，将来世世代代地傳下去，怎么能做人啊！她决定办齋飯，但是一不卖屋，二不退田，而是借了高利貸办了六桌齋飯，每桌十碗小菜。車复旦見硬的不成，又来軟的。“出喪”以后，他儿子“阿貴店王”到我家里来，假惺惺地对母亲說：“过去我对你們关心不够。現在人也死了，来，把家譜拿出来，大伯伯来替你們作个主，把你們写上家譜。”父亲临死前說过，“家譜上字字写明，两間屋、四亩田屬于車学勤的家产，千万要藏好。”母亲知道“阿貴店王”要家譜不怀好意，就說：“穷人命里苦，連累大伯伯可拆罪不起。”“阿貴店王”討了一場沒趣以后，又生毒計，竟叫了几个帮凶把我家后門口砌了一道牆，强把我家后园的一块菜地霸占去了。母亲一气之下，又去借錢托人写状到县里去打官司。旧社会是“衙門八字开，有理

无钱莫进来”。当官的都是和地主穿连裆裤子的。母亲上堂去辩理，当官的不容母亲讲话，并且说：“‘阿贵店王’宽宏大量，照顾你家男人，把地借给你种。现在你男人已死，这地应收回。”官司就此结束。家谱上明白地写着是我们的屋地，怎么会是“阿贵店王”的？还讲什么法律？还有什么家谱？“阿贵店王”在公堂上恶狠狠地对母亲说：“北佬女人，看你还狠不？”

母亲回到家里，发现我的小小妹妹不见了，找遍了村南村北也不见。原来是给“阿贵店王”家里的人骗走了。再去打官司吗？不，母亲说：“不诉是一肚皮冤，诉诉是两肚皮冤。总有一天要吐出这口冤气。”在旧社会，族长存心要赶出你，任你挣扎也住不下去。母亲又不会种田，大人小孩一日三餐要吃下去，又背了那么多的债，我们不离开车祖堂又有什么路好走呢？

总算盼到了解放。解放后，我进了袜厂做工，母亲和我弟弟又回到了车祖堂，现已改名叫槐花村。民主改革以后，我当了干部，入了党；我那弟弟也在绍兴参加了革命工作，现在绍兴县人民法院工作；我那个被“阿贵店王”家里人骗走的妹妹，在解放后也找到了。1961年我回老家去过一次，从前欺压穷人的祠堂，现在是人民公社的办公室。地主阶级打倒了，反动的封建族长制度也粉碎了。可是，反动阶级是不甘心死亡的，他们还想利用封建的宗族关系来笼络人，企图借此混淆阶级界限，恢复他们的反动统治。我们可要提高警惕啊！

（顾澄海整理）

宗族統治害得我家破人亡

於友恆口述

1962年冬，地主於德希、富农於为淦，想活动我們於姓長輩、中农於怀春出面，續家譜，修祠堂。一听他們又要搞封建宗族活动，我气得心头直冒火。村里几个年輕的晚輩，不知底細，問我，“他們現在不都入社了嘛，我們一个姓、一个族，亲戚嘛，总得有来有往。”我說：“要說亲，最亲不过是共产党、毛主席，最亲不过是我們貧、下中农階級兄弟；那封建家譜，不过是地主階級貼在我們头上的一張鬼符。”我前半輩子，就是被封建的宗族統治害得家破人亡的。

九岁帮工

我家住在江苏省江浦县，三代做帮工，到父亲手里，还是上无片瓦，下无寸土，住在祠堂旁边的一間小草棚里。父亲給地主折磨了一生，筋骨硬了，背也駝了，地主看看再榨不出油来了，就把他一脚踢开。一家人活不下去，爹娘只得把我雇給人家放驴，那时我才剛滿九岁。

1936年，我已經二十二岁，长成人了，同族地主於积光看中了我，要我帮他家干活。於积光这个恶霸地主，論輩分，还比我小一輩。家有几百亩地，还霸占了族里几百亩宗田，周圍几十里，都是他的天下。农民当面称他“大老板”，

背后罵他是“活閻罗”。我爹娘明知到他家去就是下火坑，不忍心让我去活受罪。可是第二天，於积光气势汹汹的来了，手里文明棍朝我爹鼻子上一点：“你住的那家房？你喝的那家水？你供的那家祖宗？”在那种社会里，哪样不是被地主霸占着。爹只好吞了口闷气，对我說：“友恒呀，认着火坑跳吧！”就这样，我进了他家門。

进了地主門，好比下牢門。每天，鸡沒啼，就逼我們下地，太阳下山还不收工，在田里多歇一袋烟工夫，他都記在賬上，年底扣工錢。吃的猪狗食，一年見不到几滴油珠。过年过节，地主吃魚肉，伙計啃骨头。我受不了这种罪，几次想逃出虎口，可是周圍几十里，都是他家的势力，听說是“活閻罗”家里逃出来的伙計，那家敢收？第二年夏收，我在田里一直忙到月上树梢，剛倒在床上还没閤眼，“活閻罗”又来催逼我起来挑水吊酒。那一年，天旱又热，“活閻罗”躺在夏布帳里，还叫人打扇，我一連五担水挑下来，头上象剛出籠的饅头，黄豆大的汗珠一粒粒掉下来，上气不接下气，第六担水剛挑进門，被酒蒸一熏，头发昏，脚一晃，身子“啪”地摔了下去，剛巧地下放着一坛子沸酒，一下子全澆在我身上，疼得我馬上昏了过去。当我醒过来，只見两条腿滿是蚕豆大的血泡，爹娘在一边哭得死去活来，可是於积光却若无其事，只顾心疼他那坛酒。爹娘不忍心我半死不活，只得硬着头皮，求於积光发一点“慈心”，借几块钱医伤，那曉得“活閻罗”瞪瞪賊眼，鼻子哼哼，說：“我不找你們算賬，你們还找我？你們沒望見，你儿子把我十斤酒都打翻了！”天哪，我們穷人的一条命，在地主眼里都值不上十斤酒錢！

家破人亡

我被地主赶出来了，爷儿三个还得活下去呀！爹没法，只得夹根拐棍，沿村要饭。那年，爹已经六十七岁了，背脊弯得象把弓，满头白发，他要来的饭，如果多，自己吞一两口；如果少，自己勒紧裤带，带回一瓢半碗剩粥剩饭，坐在床边上一口一口喂给我吃。当我面勉强笑笑，背着我偷偷淌眼泪。我烫伤后第二年的正月十三日，地主家正在吆五喝六吃年酒，可我家三口人，已经整整饿了一天了。那天一大早，北风刮得呼呼响，爹披了件百孔千疮的老棉袄，又出门去要饭了。下半晌，天上飘起鹅毛大雪，我娘两个从早等到傍晚，还不見爹回来，娘出门去寻找，刚钻出草棚，就見爹已倒在祠堂墙角边，冻得硬梆梆的，棉袄里还揣着要回来的半碗饭！

爹死了，家里一个铜板也没有，娘又去求於积光，心想他会看在同族情分上，布舍几个钱，买张芦葦包包。於积光坐在阴森森的祠堂里算账，娘好话说了千千万，於积光连眉毛都没动一下，半晌，把算盘朝桌上猛地一拍：“混账，你家死人还找到我头上！”娘气急了，便顶着说，“生是於家人，死是於家鬼，看你们办吧！”“活阎罗”一听，就忽地从椅子上起来，朝我娘脸上打了两记耳光，拎着我娘发髻，赶出了祠堂大门。娘经这一气，不上半个月，也死了。

骨头里熬油

我腿上的伤慢慢地收口了，能干活了，身上又有油水可榨了，於积光又要雇我去帮工。我家两条命丧在他手里，血

还没干，我死也不肯再进他家閻罗殿。当时，我一口回絕了。便在村后山边开了一亩多荒田，收了一担多麦。可於积光见到我骨头里还有油熬，一天，把我叫到祠堂里，鸡蛋里找骨头，无中生有地说：“那是我們姓於的祖坟，你惊动祖宗，該当何罪？”於积光的这一手，无非是借口逼我到他家做工。我理直气壮地说：“荒山嘛，那个都可以开，祖坟离开荒的地方远哩！”这时，平时口口声声說：“家有家长，族有族規，我們於家有事，我当凭公处理”的族长於为淦，也来帮腔：“那是祖坟头，你挖的是祖坟脚。”就这样，我开的一亩多荒地，被於积光霸占去了，麦子也被搶了去。族长这个沒心肝、专敲詐穷人的吸血鬼，穷人卖儿卖女的卖命錢，他都要从中敲詐一份。他利用族权統治农民，为地主阶级效劳。就是燙伤腿的那一年，我爹和娘向於积光借錢未成，心想找於为淦評理，他見爹娘去了，便叫着我爹的名子說：“为义，积光沒有找你們算酒賬，已經是寬宏大量的了，人心可要知足呀！”这是什么話，不是同地主於积光的話一模一樣嗎？我爹气憤不过，就說：“族长，你要摸摸良心講話呀！”他铁板了臉，指指祖宗牌位說：“於为义，你說这話，你眼里还有祖宗沒有，还有族长沒有？”后来，竟罰我爹跪在祠堂里。这是什么天下，我听了实在忍不下去了，我要去告状。村里几个老年人拉住了我，对我說：“友恒呀，你去告誰？他家有財有勢，你能告得倒？”在旧社会里，哪里有我們貧苦农民說話的地方哩！

“活閻罗”变成“笑臉虎”

解放了，我們穷人翻了身。但於积光这个“活閻罗”变成

了“笑臉虎”，他还想用宗族关系来拉攏我們。土地改革时，他把我們姓於的一族大大小小六十来戶找了去，聚到祠堂里，挂着滿臉笑容，还特地向我打招呼，他皮笑肉不笑地說：“我們是一家，臂膀总得朝里弯。过去，我於积光有得罪父老的地方，今天我向大家賠个罪，今后，我們还是一家人。”說罢，他打了揖。他說的倒好，十三年前，就是在这里，我爹娘被他逼死在这門口。这些血海深仇，我怎么忘得了！他一个花招被我們拆穿了，又来一个新花招。有天一大早，於积光笑眯眯地找我来了，一进門便一口友恒叔、友恒叔的，叫得怪甜的。我知道他笑里藏刀，就对他說：“来干什么，有話早說。”他鞠了一个躬，喃喃地說：“友恒叔，过去我作过孽，害过你，大人不記小人过，我們是嫡亲叔侄嘛！”我生气地說：“你今天认得我，我还不认得你哩！”他見我不吃这套，两条腿朝地上一跪，头象搗蒜一样，噼噼啪啪磕起头来：“友恒叔，我算过眼，我家宗田还有十担稻，你……”我真气得說不出話来，大声喝道：“眼要同你算，几十年来，全村穷人受你剝削的血債都得还！”他一听臉色发白，象一条死狗一样躺下来。后来，我当众拆穿了於积光企图腐蝕干部、破坏土地改革的阴謀詭計，发动群众斗倒了这个吃人不見血的大恶霸。

階級兄弟心連心

我已經是四十八岁的人了，过去三十多年过的是牛馬不如的生活，解放后才真正換了人間。吃了过去苦，深知今日甜，我們貧农階級兄弟，都是一条苦根上长大的，解放后不仅經濟上翻了身，政治上也翻了身。1954年普选时，农民兄弟几百双生滿老茧的手，一齐举了起来，选我为乡人民代

表。我心里激动得卜卜跳，“我能代表大家掌印把子嗎？”乡指导员好象看透了我的心思，鼓励我說，“你能代表阶级兄弟，阶级兄弟也会支持你。”这是多大的力量呀！后来我又被选为县人民代表，参加县人民代表大会。我这个三代做帮工的农民，今天居然能管理国家大事，选举县长，这是梦吧！不，不是梦。我手里拿着一張代表证，白紙上“於友恒”三个字，不是明写着的嗎？不久，我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想想过去，比比現在，我激动地說，“共产党呀，毛主席呀，您才是我最亲最亲的亲人哩！”

(朱大賢整理)

农奴血泪

陈 拓 喻富华

西藏地区完成了民主改革以后，随着最反动、最黑暗、最残酷、最野蛮的封建农奴制度的被推翻，劳动人民所处的奴隶地位，身受的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也都成为往事。可是江孜县解放二乡原帕拉庄园的朗生、堆穷和差巴，抚今思昔，却仍然记忆犹新。

骛麟家史 臭不可闻

帕拉是西藏四大古老贵族世家之一，历来亲帝卖国，罪恶昭彰，并在大农奴主中以贪婪残酷出名。

这个家族的祖先是一个小部落的酋长，后来得到大世家吞巴的提携推荐，再加上善于吹拍逢迎，很快就得到其他贵族的赏识，扶摇直上，接连出任过原西藏地方政府的司伦、噶伦、孜本等高官要职，为强取豪夺创造了条件，成为西藏有权势的大贵族。

到了帕拉·土登为登的祖父辈手里，帝国主义势力已大规模地侵入西藏。为了使自己的统治地位更为巩固，掠夺到更多的财富，这个家族就卑躬屈膝地投靠了帝国主义。1904年英帝国主义武装侵略西藏，正当西藏爱国人民同仇敌愾，不怕流血牺牲，与英帝侵略军进行武装斗争的时刻，这个家族的人却卖国求荣，引狼入室，充当了敌人的向导。以后，

还經常把帝国主义特务窝藏在他的家寺——庄孜寺里。

到了帕拉·土登为登弟兄手里，一方面繼續卖国亲帝，一方面又投靠国民党反动派，脚踩两条船。1946年，老二帕拉·旺秋以国民党伪国民大会代表“随員”的身分，去南京和蔣匪介石拉关系。由于都是卖国起家，臭味相投，很得蔣匪介石器重，数次被接見，并在一起照了象；帕拉·旺秋感到十分荣幸，直到西藏和平解放以后，还当众談論这件事。

西藏和平解放后，帕拉弟兄为了維持其反动統治，更加紧投靠帝国主义，反对祖国和西藏人民解放事业。老大帕拉·土登为登利用副官长的地位，暗通帝国主义，积极叛国，成为叛匪和反动組織的中心人物。老二帕拉·旺秋以江孜庄园为基地，明目張胆地和帝国主义来往，公开宣称自己是“亲帝分子、压在人民头上的封建主”，并网罗反动分子，成为帝国主义的阴謀的預謀人和执行者。当平息叛乱的風暴席卷西藏的时候，帕拉弟兄慑于人民的威力，逃亡国外，作了向隅而泣的可怜虫。

帕拉家族就是这样依靠着西藏反动政权、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掠夺了巨額家財。据截止平叛前夕的統計，除拉薩、曲水、山南等地的庄园和寄存在国外的大批財產外，仅在江孜、日喀則年楚河两岸就占有二十七个庄园、十二个牧場，計土地三万多克，牛羊一万二千多头和大批房产，受其奴役的农奴达三千多人。

敲骨吸髓 穷兇极恶

在进行剝削中，帕拉家族以江孜年楚河南岸的班觉倫布庄园为基地，由帕拉·旺秋亲自住在这儿监督农奴。他封官

設職，豢養大批狗腿子和打手，強迫農奴為他勞動。其他莊園和牧場也都派有管家和頭人治理。由於組織嚴密，剝削手段狠毒，每年要吞進六萬多克糧食和一千六百九十多头牛羊。另外，還巧立名目，對農牧民進行殘酷剝削。據班覺倫布莊園的記載，農奴除按規定的數字交租外，每“崗”土地（六十克到二百克地）每年要出四百九十八個長年烏拉和一百三十六頭畜力、十二隻羊的肉、二克酥油、一百斤羊毛等幾十種烏拉差役，甚至連莊園里燒的牛糞、染衣服的染料、掃地的掃把、野蔥野蒜、奶渣等四十多種物品也得按土地克數分攤征收。從1952年起，每戶農奴每養一隻雞，還要交一百個雞蛋。這樣，農奴一年的農、副業收入，被他剝削去百分之八十以上。

貪得無厭的農奴主仍不滿足，仍要想法剝削農奴。本來，外差地對原地方政府的負擔應由主人負擔，但帕拉·旺秋卻將這些烏拉差役全部轉嫁給農奴。據白朗縣一個帕拉莊園的統計，農奴除按“崗”向帕拉交地租、烏拉差役外，還得向原地方政府交納各種雜稅二十項，其中包括宗本伙食費十克糧食、羊肉三十二藏斤、酥油三克、官員應酬費一克糧食、驛站修繕費五克糧食和敬神費、紙張費、草料費等等。這還不算，他的自營地全部由農奴出烏拉、農具、肥料和負責耕種，只在翻耕土地時使用他的耕牛，還得出耕牛費。有時他看到自營地里的莊稼長得不好，就把地“暫租”給農奴，收取高額地租。1956年，他就以這樣的方式，把江嘎莊園的一些壞莊稼分租給五戶差農，每克地收租四克糧食，而這些地當年每克地只收了三克多糧食。每年秋天，勞動一年的農奴人背畜馱，前來交租，先得送哈達、雞蛋等禮物，請求“恩准”

开斗。开斗时，一般人都要用木棒刮平斗，而他却收尖斗，把粮食倒得直向外流，每斗多收三分之一的粮食。满清王朝被推翻已经半个世纪了，可是帕拉·旺秋每年仍从每“岗”土地上给皇帝“代收”一百到二百两藏银的“孝敬”。

这样的剥削该完了吧？不，还有。每年春天粮食涨价时，他往往以“救贫”为名，把粮食以高于市价一倍的价格强卖给农奴，不管你缺粮与否，都得买。并且规定现金交易，不能欠账。农奴没法，只好含着眼泪从他家把粮食背到市场上去卖，给他交现款。一进一出之间，赔损一半。他家的青稞霉烂了，牛奶坏了，他就把青稞炒一下，把牛奶作成甜茶，强卖给住在庄园里的农奴。卖时排队点名，不许不来。当时交不起钱的，就记账作为欠债。

强取豪夺 触目惊心

在这样残酷的剥削下，农奴的生活十分困苦。为了不被饿死，就只好靠高利贷度日。帕拉·旺秋便借此机会，卡住他们的脖子，吃肉喝血。他是有名的“过手三分利”，剥削的门道多，谁只要是沾上他的债务边，好象把脖子伸进死套，吃尽苦头。而在农奴们倾家荡产的哭声中，他却每年得到四五万斤粮食、数万两藏银的利息。更加毒辣的是，他看到谁较富裕，就强迫他借自己的债，达到夺取财产的目的。莎鹿牧场上有七户牧民，原来都不租放帕拉·旺秋的牛羊，可他垂涎这些户的牛羊，硬把羊强租给这些户，规定每年“三母生二羔”，每二年算账一次，生不够这些羊羔就以牧户原有的牛羊抵数。不到十年，半数牧民破了产。牧民顿珠在这样剥削下失掉了全部牛羊、家产，最后淪为他的朗生。

地租、烏拉差役、債務是纏在劳动人民身上的三条毒蛇，許多人被逼得家破人亡。可也有少数人仍能勉强过日子，这时，帕拉·旺秋就进行赤裸裸的夺取。农奴当牛作馬，劳累而死，仍逃不过他的魔掌。誰家死了人，都得把死者生前最值钱的东西送給他，請求他“恩准除名”。他平时外出，屬民們要“送行”，回来时要“接風”，都需要一批厚礼。如果有人送得迟了些或送不起，他就会責怪你不知尊重主人，輕則罰錢，重則掌嘴。誰家有什么好东西被他知道了，就派人到其家把东西“借来看看”，然后便永不归还，据为己有。

如果用这些办法仍然达不到目的的話，他就会設辞陷害，扒鍋搶东西。有个名叫白馬多吉的差巴，生活过得較富裕，惹得帕拉·旺秋眼紅，就借口他娶老婆沒有向自己报告这件事，把他抓去关在監獄里，赶走了他的全家，沒收了全部財產。白馬多吉只好怀着滿腔悲憤，飄落他乡，从此再无消息。

穷奢极欲 荒淫无耻

农奴呻吟在淫威之下，有的累死，有的餓死，而帕拉一家却过着揮霍无度、荒淫无耻的生活。为了修建班觉倫布庄园，前后二十年間，經常有几十戶农奴奔波在外，人肩牲畜馱，从亚东运输木料；一百多个农奴，爬山越岭，搬运石头。許多人臂断腿折，許多人死于沟壑，才建成了这座樓閣重叠、彩栏迴繞的豪华的庄园。这里面有臥室、厨房、洗澡間、书房、倉庫、刑室、監獄等一百多間，在大宅旁的林卡里，还修建了一座专供打牌的西式凉亭。

虽然农奴主和农奴居住在一个院墙里，却分成两个世界，

过着居不同室、食不同器、用不同具、語不同辭的生活。帕拉·旺秋只有两口人，却占据着窗門雕窗、五色玻璃閃閃发光的三十多間高級房子，而有一百三十三口人的三十六戶朗生，却只能住在一些黑暗的小房子、馬棚、牛舍和廊檐下，不管天冷天热，刮風下雨，都是如此。在这里，供帕拉·旺秋役使的有上百个朗生。在他的专用厨房里有二十多个木架柜，堆滿山珍海味、中外名酒、中西式糕点和进口水果……有两个在国内外受过专门训练的厨师，給他輪流做着中餐、西餐和藏餐。他每天的伙食費平均达到五十元，而每个朗生每天却只有半斤发霉的糌粑。帕拉·旺秋养了許多馬和狗，不但各有专人照管，馬还能吃上上等粮食、鸡蛋、青油，狗每天还喝酥油茶，吃酸奶子、稀飯，有时还吃面条。有只哈巴狗，还和主人吃着同样的伙食。

帕拉·旺秋两个人有八十多箱衣服，仅各类皮衣就有一百多件，其他珍貴物品不計其数，而朗生却衣不蔽体，最值錢的东西就是一只破木碗。当帕拉·旺秋起床的时候，有两个佣人給他穿衣，一个佣人給他穿袜着靴。当他吃飯的时候，专有一个佣人代他剝鸡蛋皮、削水果皮。他要上厕所了，就有一个佣人給他端着油漆坐架、拿着手紙。他要洗澡了，就有五六个佣人給他脫衣、拿帽、端水、搓背。他外出时，有五六个佣人牽馬圍护，还有一个佣人专门背着鋪有花垫的上馬凳。即使这样，他却常常不用上馬凳，而要朗生蹲下来，踩着人的身子上馬。

当他酒醉飯飽之后，无所事事，就打牌度日。打牌时有五六个佣人輪流倒茶服侍，还有一个管家拿着一包袱錢，給他在在一旁算賬开錢。他却“一擲千金”，有一次就輸掉二千多

克糧食。但朗生如果因餓得沒法偷吃了他半碗剩飯時，就得被他抽打一頓。

這樣的生活仍不能使帕拉·旺秋滿足，仍然想方設法“消遣”，填充他那無聊空虛的靈魂。他規定農奴的婚配要事先向他報告，得到他的批准，便利用這個機會詐取錢財、奸污婦女，實行中古歐洲領主那種初夜制度。有時他打牌高興了，就讓爪牙們四出尋找女人，供他淫樂或集體奸污。有時哪戶農奴的女人被他看中，就公開前去侮辱。

種種折磨 斑斑血痕

帕拉·旺秋在政治上、經濟上壓榨奴役農奴的同時，還常常別出心裁地想出種種辦法，折磨農奴的精神和肉體，發泄獸性。他家有幾十個專門捻毛綫、織藏毯的朗生。他們一年到頭天不亮起床，一直干到深夜，不能休息。有的人在干活時打瞌睡，他就上前去扯他們的頭髮。為了使朗生多干活，他竟實行“定坐”的辦法，朗生上工後，就在他們的衣服下擺和土地相接處撒上沙土，用大木印蓋記，隨時檢查，誰的印記動了，就得挨打。朗生們不敢動一動，拉屎拉尿都是原地不動。為了防止女朗生因給小孩喂奶耽擱時間，他進行了“改革”，每天把朗生的小孩集中在一間黑屋子里，用鎖鎖上，說是“托兒所”，不到放工時間，不許母親去管。結果，孩子們在屎里尿里亂爬，互相亂打，有的餓得哭啞了嗓子，有的全身都是傷痕。在這樣折磨下，不少孩子遭到慘死。

要是他打牌輸了錢，就以抽打朗生、僱人來“消氣”。有一次他在輸錢後，一個晚上就打了十八個僱人。在一片哭喊、告饒聲中，他却哈哈大笑。朗生次登被打得忍受不住，邊哭

边跑，他就丢下皮鞭拿起一根木棍在后面追着打，一棍下去，打断了次登的脚骨，没多日子次登就痛得死去。为了防止朗生在挨打时跑，累了他自己，就在抽打之前，借故把他们集中在林卡里，让爪牙们排着打。而他却命人端来椅子，坐在一旁监打。打一会，还得亲自上前检验，看看朗生的屁股出血没有，不到见血不罢。

残忍成性的农奴主什么样的事情作不出来！有次他看到别人牵着猴子玩，很感兴趣。可是他想了想，玩野猴不如玩“人猴”有趣。他立即到一个名叫尼马仓决的朗生的家里，借口她没有正式结婚而生了孩子，说她是下流人，她的孩子是“下贱种”。为了“惩罚”她，把她硬配给一个铁匠，把她的只有四岁多的儿子拉巴日达没收。他把孩子的名字改为“阿郭”（原始人），作为自己的“人猴”来玩。为了使小孩的样子更像猴子，他不给小孩吃饱饭，饿得小孩瘦瘦的。他吃饭时，让孩子站在一旁的椅子上，拄根小棍子，作着猴子的样子。高兴时夹一筷子菜丢在地上，孩子爬下来拣着吃，而后又爬上去。他按照外国兵的样子给小孩设计了一套白衣白帽，打牌或宴客时，让孩子穿上拄根棍子站在旁边的凳子上。久了，孩子困了，从凳子上掉下来，他便提着孩子的腿，又放上去，为了向人夸耀他的“人猴”，每逢外出，总要备一匹马用绳子把小孩绑在马鞍上。有次路上马跑得转了鞍，小孩被拖了很久，磨得头破血流，痛得直哭，而他却笑得合不拢嘴。

野蛮残酷 令人发指

在那样的时代里农奴所受的痛苦是多么深重啊！

农奴被迫害得生活不下去，就往往以逃亡的方式逃避灾

难。可是他們却走投无路，逃不出农奴主的魔掌。現任乡长格桑頓珠的遭遇，就足以說明这个問題。他原来是个較富裕的差巴戶，种帕拉家一百三十克土地，有二头耕牛、二头奶牛、三十只羊、一匹馬、七头毛驴。帕拉·旺秋貪图他的财产，把他祖父手里借的三十多克旧債“清理”了一下，变成一千克粮食的新債，每年打鞭子、掌嘴、关監獄，逼他还債。到1951年，他家就破产了。为了躲避一年一度的“比”期，全家七口人全部逃了出去。被帕拉·旺秋知道后，就把他抓回来当了朗生；其他几个人多是年老和年幼的，沒有劳动力，仍然在外过着流浪乞討的生活。到平叛胜利、进行民主改革时，这家人才团聚在一起，但只剩下四个人了。

难道就沒个“王法”、“天理”嗎？不是有个“噶厦”政府嗎？有，有“王法”，有政府、軍隊、法庭。可这些都是为了维护封建农奴制度而存在的東西，是直接为农奴主階級服务的，是要镇压农奴階級的反抗的。就拿已經执行了一千多年、包括十六条保护农奴主階級利益的西藏“称依”（大法典）來說，就有这样的規定：“向王宮喊冤，不合体統，应逮捕械击之；不受主人約束者拘捕之……”如果发生了触犯农奴主利益的事，法典規定应“按其情节不同，或挖其眼睛，削其腿肉，割舌，戮手，推墮悬岩，拋入水中，或杀戮之。以惩戒将来，免其效尤。”同时，帕拉弟兄都是位高势大的人物，老大帕拉·土登为登作过堪穷、“江基”（藏北总管）等官职，后来还作了“卓尼欽波”（副官长）；老三帕拉·多吉旺堆，从第一代本的“代本”一直作到“頗康列空”（粮务局）的“頗本”（主管）；老二帕拉·旺秋由于叛国亲帝有功，原西藏地方政府給他封了四品官。他們先得到了几个攝政的垂青，

以后又和反动头子索康·旺清格勒、凯墨·索南旺堆等勾结一起，紅得发紫，誰敢惹呀？这些加在一起，就形成重重罗网，使农奴有冤沒处伸，有苦沒处訴。如有个叫昂剛的农奴被帕拉·旺秋捉去当奴隶，他在黑夜里逃走了。帕拉·旺秋就到处捉拿，捉不到昂剛就把他的哥哥关进监狱，毒打致死。昂剛忍无可忍，到拉薩去向原西藏地方政府告状，請求“伸冤”。可是，反动政权却根据“法律規定”把他交給帕拉·土登为登处理，帕拉·土登为登又把他押回江孜交給帕拉·旺秋。帕拉·旺秋为了“惩戒将来，免其效尤”，把他关进监狱，每天晚上点着汽灯拷打，結果活活打死了昂剛。

× × ×

西藏有句諺語說：“天沒有不亮的，理沒有不明的。”

尽管三大領主在自己封地的文約上写着“永屬所有”的字样，企图永远保持封建农奴制度。但是，“天”終于亮了，在偉大的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西藏劳动人民終于打碎了封建农奴制度的枷鎖，成了土地的主人，开始了新的生活。他們听党的話，走互助合作、共同富裕的道路。他們如旭日之东升，高歌猛进，正在医治旧社会遺留下的創伤，建設自己美好的家园。

1963年，全乡农业生产互助組已发展到二十一个，入組戶数达到全乡总戶数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通过互助生产，全乡生产有了很大的发展。过去每克土地最高只能产四克粮食，1963年平均克产已达到四克半以上，有的还能产到五克多粮食。民主改革时全乡只有一百七十二头耕牛，有二百六十二头奶牛，1963年耕牛已增加到二百零七头，奶牛已增加到三百二十九头。随着生产的发展，人們的日子越过越美。

原来属于帕拉·旺秋的班觉倫布庄园的三十六户朗生，也都翻身作了主人，有了房屋、土地、耕畜、农具和牛羊，而且生产发展、人畜两旺，仅人口就純增加了百分之七。原来被帕拉·旺秋害得家破人亡的格桑頓珠，現在担任了乡长。他家在民主改革时只剩四口人，現在有六口人。他原来无地无牲畜，現在有了自己的土地、房屋，还有一头耕牛、二头奶牛、九只羊、二架犁，其他农具齐全，过去每人一年到头一身破烂衣服，現在每个人不仅有平时穿的衣服，还有节日穿的衣服；过去穿衣服一年四季一身白，現在是各样顏色都有，他夫妻俩还添置了三件絨衣。

在幸福的日子里，群众不忘过去受的苦。他們說，苦的根源是封建农奴制度，甜的原因是由于有了共产党！要永远跟着党走，永远保住人民的江山！

血泪斑斑忆过去

李景芳 包晨云 何 川

烏兰图嘎屯（大老爷府屯），是吉林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烏兰图嘎人民公社烏兰图嘎生产大队的所在地，距县城一百八十里。屯址座落在几个大沙坨子間的洼兜中，耕地有旱田，放牧有牧场，蒙、汉杂居，是个农、牧两业兴旺的好地方。然而，在反动阶级統治年代里，这里的农民、牧民們，世世代代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受尽人間地獄的折磨。翻开烏兰图嘎屯近百年来历史，我們看到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景象：反动統治时期，人民血泪斑斑；解放以后，人民喜气盈盈。这反映了烏兰图嘎屯在新旧两种社会制度下的不同命运。

老爷世襲奴隶傳代

近百年来，这里的反动統治者，是清王朝封立的世襲“土煞拉克其”（部落长）。部落长权势在握，屯里屯外没人敢叫他的名字，十里八村通称他为“包大老爷”。包大老爷有旱田四千五百多亩，馬、牛、羊两千多头，还有无数的奴隶。这些农田，全是奴隶辟荒开垦出来的；这些牲畜，也是奴隶放牧繁殖起来的，所有权却属于包大老爷。奴隶自己，沒有一把沙土，沒有一只羊，就是他們的人身肉体，也是属于包大

老爷的。

老爷为了巩固政权，驯服奴隶，定下规矩礼法多条：奴隶为婢，不能在老爷的青砖四合瓦房的大院里出生或死亡；奴隶住的是进门弯腰的“马架子”，老爷一撵就得立即搬出；老爷坐在炕上，吃山珍海味饮美酒，有奴隶在旁边伺候；奴隶吃粗粮稀粥，不许用碗盛，得跪在槽子前用手捧着喝；进老爷屋得低头轻步，出老爷门得倒退而行；平常见老爷，单腿屈膝下拜，三日没见老爷，再见面时，双腿下跪问安；行经老爷门前半里外的大道，骑马的下鞍步行，步行的低头慢行。

奴隶好特劳的父亲带着伤寒病，被大老爷鞭逼，穿着露肉的单衣，冒着呼啸的北风，顶着冒烟大雪，出屯放牛，被活活地折磨死了。母亲也因过度的苦役劳累死去。十五岁的好特劳，对老爷心怀怨恨，被三喇嘛发现以后，一年四季不给他一条布丝穿；他的一个三岁、一个一岁的弟弟，冻饿得哭叫不止，他要送点凉水充饥，狠心的三喇嘛都不准。好特劳问三喇嘛：“难道奴隶就该饿死吗？”三喇嘛说他是以小反上，把好特劳捆在门洞，非刑吊打后，又罚他在石头上坐着。三九天的石头拔骨凉，赤身裸体的好特劳，冻得全身发抖。晚间，还不许好特劳进屋，叫他在猪圈过夜。第二天，三喇嘛见好特劳仍有不满情绪，就又把他在毒打一顿。从早晨打到晌午，三喇嘛烟瘾发作，进屋抽大烟，叫好特劳在窗外烧暖炕。烧炕时，好特劳身子一暖和，伤口剧疼，昏倒过去。三喇嘛又把他打醒了。他觉得无法再活，一头钻进灶坑里去。三喇嘛怕他死了少个奴才干活，又把他拽出来，打得更凶了。好特劳情急无忌，一头向三喇嘛撞去，三喇嘛见奴才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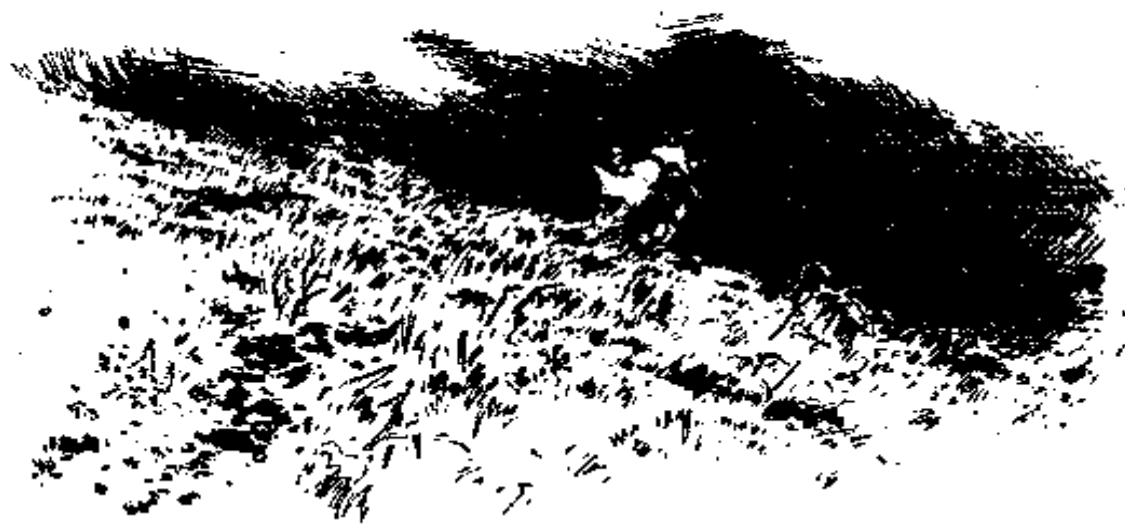
抗，一火叉子把好特劳打倒在地。三喇嘛怕他死在大院子里，破坏了大老爷的规矩，才叫好特劳的哥哥把他背回家去。家里的小弟弟见哥哥回来成了血人，哭喊叫怕。好特劳惊醒后，看着不懂事的弟弟伤心地说：“你们长大了，能不象我这样子就好了……”

对老爷有一点不满情绪，就遭到这样惩罚，违反老爷规矩礼法，反抗老爷，更要受严刑拷打，甚至被杀害。一年夏天，有个老胡头，从屯东来，想去西屯，老远见老爷在门洞里纳凉。老胡头不愿给老爷下跪问安，抹身向南，绕道而去。老爷说他破坏了规矩礼法，命人追回，绑在长凳上，打了个皮开肉绽。贾、李、马、隋四户家奴，原是清朝某公主的陪嫁奴。原规定：公主死后，他们可以回原籍，可是公主已经死去多年，包大老爷仍不放这四户的后代回去。这四户的后代，因受不了老爷苦役，选出七名长辈为代表，拿着家谱想去北京告状。老爷发觉后，假摆宴席送行，在酒里下了毒。饭后，这七人走到屯西十五里的地方，毒药发作，昏倒在地，被老爷的差役活埋在荒郊野外，并搜出这四户的家谱，剪成碎条。这四户家奴伤了七条人命又失了家谱，子孙后代永远成了老爷的“家奴”，并遭到更严的管制和更重的苦役。

民国建立老爷照旧当权

清朝统治者倒台，民国建立，王朝变了，可是掌权的阶级没变。烏兰图嘎屯仍然是包家的天下。原来给包家代管地租的差役，也成了二地主。全屯十八户奴隶，一百零九户佃农、长工，在大地主、二地主的残酷剥削下，成年苦累，不

得温饱，被生活所迫，卖儿鬻女的，不堪胜数。班山札布一家七口（老婆、五个孩子），全靠种老爷的地为生。一年到头，风雨不误，但却落得四季衣不遮体，食不饱腹。一个大雪漫天、北风呼啸的腊月夜晚，班山札布因为饥寒病倒了。为了活命，班山札布忍痛把十二岁的女儿——灵芝，卖给包大老爷当奴隶。又把十五岁的大女儿给别人做了童养媳。当老爷来拉人时，病在床上起不来的班山札布和他的老婆心如刀割，眼看着亲骨肉被送进火坑，一家人生离死别，顿时难过得昏迷过去。后来，班山札布在高利贷催逼和饥寒交迫下，走投无路，最后竟不知去向。乡亲们猜他是在荒郊寻了短见，包大老爷还硬赖他当了土匪，把班山札布的老婆孩子撵出了乌兰图嘎屯。班山札布的老婆怀里抱着一个，手里领着一个，后面还跟着一个，母子四人无处投奔，只好露宿在荒郊野外的大草甸子上。夜里荒草甸子里黑茫茫，野兽嚎叫，大儿子跳脚要找爸爸，二儿子喊着要回家，小儿子咬着妈妈干瘪的奶头吃不出水来，饿的直哭。班山札布的老婆难受得说不出一句话，只是仰着脸，一双干巴巴的眼睛，望着漆黑的天。



伪满地主汉奸横行霸道

1931年，日本鬼子侵占了东北，包家族长阿力牙扎布，变成了烏兰图嘎屯的大村长。虽然保护包大老爷政权的四个大兵营撤了，可是又設立了警察署。防疫班、协和会、兴农合作社，也都冲着劳动人民挂上了狼头招牌。劳动人民把这些反动机构看成是“閻王殿”，地主把这些当成护身符。地主和这些“活閻王”勾結起来了，欺压得穷人更加难活。全屯能吃上糠菜半年粮的，仅占半数，冬天能穿上破棉袄的仅有三十几人。白音沒有一件能遮体的衣服，掐高粱的时候，天不亮就跑到地里干活，天黑妇女都睡下了，他才敢进屯。中午屯里人多，沒法回屯吃午飯，只好求伙伴給带块凉大餅子，蹲在高粱碼子下，背着風吃。白音就象牛馬一样給地主榜青，一天工不歇，盼望秋后丰收多分点青份（粮食）。这年果然丰收了，白音盼地主算賬盼得两眼紅，家里等着吃粮等得肝腸断。落小雪的时候，地主拿起算盘叫白音。白音乐得合不上嘴，心想今年大丰收，怎么也能分上二十石粮。地主算盘一陣嘩拉拉响，发話了：“白音呀，今年你不錯呀，分十石粮。”白音听了一楞，打好几百石粮，怎么才分得十石？地主接着用手把算盘珠一撥拉：“白音啊，扣你榜青时吃的口粮两石。”白音暗想：榜几个月青，一石五也吃不上，就扣两石？白音忍气吞声沒言語。地主接二連三的又撥拉开算盘：“扣做飯工錢一石，去更官粮五斗、官工錢一石三、农忙叫短工錢五石……”扣来扣去，分的十石只剩二斗了。这二斗也拿不回去，因为春天家里沒吃的，借了地主一石五斗粮，秋后加利錢得还三石；又在青黄不接时，借高家六斗白沙谷，当时粮

貴高家合成錢，大加一利，秋后粮賤时，又把錢合成粮，三番两合，結果春天借这六斗白沙谷，秋后变成三石了。……算来算去，白音頂風冒雨白干了一年，倒欠地主五十二元高利貸。白音和全屯佃戶、长工，就是这样年頂年的苦累，年頂年的穷，越干越挨餓，越背高利貸越重。

除了經濟上的盘剝，地主还和警察、汉奸串通一气，抽壮丁、抓劳工，逼得穷人走投无路。二十岁的雇农李洪福，伤寒病刚好，正赶上大村长阿力牙扎布的侄子温杜素應該当兵，阿力牙扎布利用权势，硬让李洪福頂替。李洪福父亲有肺病臥床不起，母亲一只胳膊殘廢，一家人的生活全靠李洪福給老爷榜青維持。唯一的劳动力被拉走了，剩下老父殘母怎么活下去呢？可是老爷們不管，要李洪福去当兵，馬上集合，立刻出发，生拉硬拽把李洪福推上了車。躲过当兵也难逃“奉仕”劳役。在表面上規定，一人只“奉仕”一次，可是大村长要看上誰，那就不知是几次了。給包大老爷榜青的吳連庆，不甘心受老爷剝削，不使勁給老爷干活。老爷就叫吳連庆連年去“奉仕”。吳連庆的父亲卖掉身上唯一的夹袄，換了十二个大烟泡，送給大村长的助理，托他讲情留下儿子。助理把大烟泡抽了，吳連庆仍然被弄走去“奉仕”。青年人被抓去当兵、当劳工走了，剩下的老弱，还要經常給村长出杂工。

各种各样的苛捐杂稅，更是名目繁多。灶戶門錢每戶每年一石三斗粮，祭神树錢每戶每年三斗粮。这些已够穷人受了，但还不定什么时候，又出来花銷。一次，包二老爷打死“柳子”（土匪）上的一个人，“柳子”不答应了，經人說合，給“柳子”二十七石粮才算完事。人是包二老爷打死的，可是粮却得由穷人摊。至于奴隶“孝敬”老爷的錢就更多了，“长子

結婚費”，老爷大儿子結婚时的請客招待費大家攤；“祭靈費”，老爷家死人的時候，每戶出五斗糧；“上陵費”，每年紀念死去的公主四次，平均每戶每年二石五斗糧。

警察是老爷、地主喂養的爪牙，誰反抗地主，警察就出來鎮壓；地主想欺負誰，警察就幫凶。包家地主的大兒子蘇日他拉，長着一付黑心腸，成天為非作歹，專做壞事，姑娘都不嫁他。蘇日他拉看上了白音的妹妹淑英，淑英那里肯嫁他！淑英早已許配給雇農的兒子木熬好。蘇日他拉硬要霸娶，他的干兄弟偽警尉補，就出頭給他搶親。捏造淑英和街坊金道爾吉私通，把淑英、金道爾吉和白音三人都抓到警察署。白音等不承認，偽警尉補就毒打他們。白音是全家唯一的勞動力，淑英怕打壞了哥哥，全家生活成問題，只好忍辱含冤承認了。偽警尉補又一方面宣揚淑英是壞女人，破壞她的名譽；一方面把她的未婚夫木熬好叫到地主家裏，用威利誘的辦法，硬逼木熬好和白音的妹妹退婚。事後，偽警尉補向白音編造說：你妹夫已經提出和你妹妹退婚，你妹妹也同意嫁給包家，你同意吧？白音不信，仍然堅決不同意，警察們又輪打白音的耳根子，打得白音頭昏血流，吐了三四天黃水。

防疫班也仗勢到處拚錢害人。誰給他們湊兩個錢，他們就走；不然借口防治傳染病，就給你打定血針，把活生生的人害死，窮人說他們是不拿生死簿的“活閻王”。1943年的秋天，住在屯東頭的雇農高老疙瘩，連自己家的生活都難維持，哪有錢供奉防疫班呢？有一次高老疙瘩因飢餓勞累生了病，防疫班就借機會，硬說他得了傳染病，掏出定血針，打進高老疙瘩的肉裏，針拔出時，年輕力壯的高老疙瘩就一命

嗚呼了。

一年冬天，由于缺吃少穿，馬架子里滴水成冰，在冻、餓、愁交迫下，白音全家得了伤寒病。伤寒病要盖被发汗，白音家連条麻袋片也沒有，只有两件旧蓑衣，他父亲知道活不成了，就告訴白音說：“我死后，把我順到炕腳底下用草盖上，千万別叫警察、防疫班发现。他們要知道了，你們几个人都得挨定血針，可就全沒命了……”話沒說完，白音父亲就死了。白音的父亲剛死，警察、防疫班和屯长就来了，要把他家的門窗全用大釘子釘死，一个人也不許放出来。

在反动階級統治的年代里，劳动人民真是上天无有路，入地无門，头頂苦难万斤沉，何年何月能翻身。

共产党领导农民彻底翻身

1945年的秋天，日本鬼子投降的消息，傳到烏兰图嘎屯。小鬼子倒台了，可是包大老爷能不能完蛋，穷人們心里可沒有个底。1946年的春天，大地主包清俊領着一百多号人馬进了屯。大老爷們都称他是包营长，其实他并不是什么营长，而是地主組織起来的胡子队头目。他整天吃、住在大老爷家，还三天两头召集全屯人开会，两手叉腰，耀武揚威地对大家說：“穷小子們，誰要是敢来斗包大老爷，我就叫他人头落地。”以后他們就盘踞在烏兰图嘎屯一带，橫征暴斂。

第二年春末，屯里来了三个南方人，住在雇农白音的家，經常和穷人唠嗑，打听誰最穷，誰受压迫最深。天常日久，生人变成了熟人，这时大家才知道他們是八路軍的工作人員。也知道其中一个是張主任。不几天，包清俊被八路軍抓走枪毙了，大家拍手称快。張主任叫白音把穷人召集到小学校

开会，众人听说，给信就到。张主任在会上讲了穷人为什么穷？富人为什么富？地主是谁养活肥的？张主任问大家敢不敢闹翻身？这时贫雇农和“奴隶”的拳头好象铁锤一般，齐唰唰地冲天举起，大声回答说：“敢！”第二天，一帮人由白音率领到西大院，一帮人由白豆、胡彦明率领到东大院。人们好象决了堤的洪水一样，拿着木棒、马鞭子，拥进了地主的大院。白音身背着一棵“火燎杆”的连珠枪，第一个进了院，后面的人们随着拥进了院内，把大老爷才音伯牙尔、二老爷阿力牙扎布绑了起来交给工作组，取得了第一次的胜利。

乌兰图嘎建立了有史以来的第一个人民政权——乌兰图嘎区人民政府。从此，乌兰图嘎屯的穷苦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过着幸福的生活。当初因给小弟弟送水充饥被三喇嘛打的几乎死去的好特劳，现在已经有四个孩子。他们都胖胖实实的，每天上学校读书，冬天棉袄厚的走动都费劲，再不去象他父亲给大老爷干活时候的那样，十六岁还光着腩。过去几乎全家送了命的白音，现在是大队党支部书记。她的老母亲，常常早晨起来，坐在热炕上，喝着浓茶对子孙们讲：“过去咱家连一半糠一半菜的稀粥都喝不饱，现在吃的好、穿的暖，你们长大了，可要一心跟着共产党，走社会主义的路啊！”

山丁忆苦

叶·七口述

你到过广西大苗山嗎？你要看到我們遍山的森林，你会羨慕我們生活在宝山中。可誰能相信，过去，我們活着沒有木料盖房子，死了也沒有棺材埋葬！

为什么？林子給人家霸占去啦！那时候，連荒山野岭也是山主的私有财产。我們貧苦农民要活命，就得求山主批山立契，做他們的山丁，替他們开荒造林。按契約規定，所批的山，要在一定年限种完，否則，已种的树全归山主；造林时，間种的杂粮归山丁；林木长成后，按棵数对半或四六分成。共实山丁分得那几成，只要山主的算盘珠子哐哩拍啦一响，就进了山主的大肚子里，剩下来的也在百般刁难下，以只值市价十分或二十分之一的賤价卖给山主。契約还規定，山丁卖木一定要經過山主同意，不能随意卖给別人！所以我們河口寨四十五戶貧雇农，种的山虽然寬到沒边，解放前却沒有一戶直接向商人卖过木头。要有的話，只有一戶卖过半次……，是半次，不会記錯，因为这一戶就是我呀！

我們爷仔花了十几年工夫，开了一大片山，种下了万棵树。树逐渐长大成材了，眼看就要給山主叶甫壮吞去一半，其余的也要賤价卖給他。一天，叶甫壮不知哪来的好心，笑咪咪对我說：“叶七呀！也算你們辛苦一場，好容易才帮我种

得这一大片山杉木，看在同宗共祖份上，你就全部拉出去卖了吧，以后我们再谈分成。”

“什么？……”天下哪有这样好的事情？我以为是做梦，便结里结巴地问。可是叶甫壮又千真万确地说了一次：“你就全部拉出去卖了吧！可怜你叶七和我共个叶字，就算是照顾你吧！”

我的眼睛充满了感激的泪水，想不到山主里也有善人！我一边抹泪一边说：“我叶七也不是忘恩负义的人，子子孙孙也忘不了你的恩典。”

“自己人嘛，这算得什么！”他满意地点点头，笑吟吟地走了，一会又停下来交代：“你赶快找人拉出去吧！请伙子缺钱少米，就到我那里拿，不算利息，自己人嘛。”

我想，叶甫壮平日待人刻薄，现在为什么突然变得这样好？也许是看见我替他种的杉木长得好，一时心头高兴，也可怜我这“本家”辛苦吧？我穷得发昏，竟完全相信了。我算道：一棵杉木卖两毛，我这么一大片，除了伙钱，四六分成，我最少也得五六百块钱呵！今后，我再也不会住“热天象蒸笼，冷天象雪坑；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的破屋子了，还清了债，首先得起间“柱栋房”。小小的一间也好，别让子孙再象祖宗那样受苦！

我邀请了一帮穷弟兄帮我将木头砍倒下来，拉到河边。缺少伙钱伙米，就向叶甫壮借。穷弟兄们见我能自己卖木头，都高兴为我使力，我们一天拉到晚也不晓得困；不管有多高的拉木道，我们也飞风地跑，还一边唱着苗歌。我们的汗水，滴在拉运的木头上，滴在拉木道下沟里的乱石、草木上。接着，我们便将木头推河、扎排。那时融水的木头行情正涨，



眼看十天八天以后，这七千多根杉木就换回来一千五百块的光洋，我的嘴整天笑得象喇叭花。

誰知道！那天，我正在屋里打点放排的东西，叶甫壮忽然带着几个狗腿子跑到我家。

“叶七，好几天沒見你啦，排扎好了嗎？”他問，笑得象庙里的菩薩。

“扎好啦！明天就可以开排。”我忙着让坐、倒茶。

“自己人，別讲礼啦！”他推开我递給他的烟杆，冷冷地

說：“叶七！两个多月来，亏得你帮忙将我的七千多根木头拉到河边，我以后一定重重謝你……”

什么？帮他拉木头！这回我又以为听錯了話，誰知以后更多的話，却象釘子般一个又一个地釘进我的心：“融水，你不用去啦！明天你和我到河边点点数。除我的外，你那些就照以前說的价錢，多給你一些——一个东毫二十根！”

我的天！他什么时候和我讲过呀！明知山主的話就是王法，我还想掙扎反抗：“你不是說让我一起卖了再分成嗎？”

“我怕你发癩囉！”叶甫壮的脸顿时漲成猪肝色了，“你沒算算你是什么命！你是癩蛤蟆想吃天鵝肉！誰答应你自己卖的！有哪个证人在場！盘古以来，你見有过山了自己卖木的章程嗎？你是拿了皇帝的圣旨还是县府的命令啦？你还想看看你盖过手印的山契嗎？你乱拉我的木头，我不到乡公所告你就算好啦！你不想想，不是我的木头，我肯白白付几百块給你做伏錢、伙食嗎？……”

几个狗腿子也在旁边帮腔。

天下哪有这样蛮不讲理的呢！叶甫壮，人面狼！原来你叫我拉出来自己卖，是个大奸計！原来你叫我支錢支米，不算利息，打的是这鬼算盘！我眼花了，头昏了，一刹时昏天黑地，象是掉进一个黑古隆冬、冷气逼人的无底深潭里。可那时，我又有什么办法呀！人家有錢有势，官是人家的官，理是人家的理，喊天天也不应阿！狼永不能回心轉意改变吃人的本性！吃一塹，长一智。我不再哀求，我忍住眼泪、咬紧牙根对叶甫壮說：“做事情也要讲点道理，留点后路。一个东毫二十根，我連伏錢也不够呀！”

“伏錢么？沒問題！”叶甫壮拍了拍胸脯，做出大大方方

的样子，“我的伙钱我照给，每工给回两角钱。唉！可怜你叶七和我共个‘叶’字，就这样算了吧！”

天哪！说来说去还是一个东毫二十根！当时的市价却是两角多钱一根呵！一个工当时每天是两角五分钱，我们这样子发狠做，起码要值四角钱，穷兄弟因为是帮我，才收我两角！现在他也“照给两角钱”，这不是又强抢了我们穷弟兄几百块钱么！

我流干了眼泪，在人前，我眼泪往肚里流。要是不解放，我还不是依旧住在那比猪圈灰房也不如的破烂屋吗？

今天，谁到我家做客，都夸我的房子漂亮。那不假，我还把它叫作“龙宫”哩！所以我常常对那些晚辈后生讲，“要配住，只有毛主席才让我们这些旧社会的山丁，住上高大、宽敞、漂亮、舒适的‘柱栋房’！”

(蓝宗镇整理)

牛栏旧恨

吳永培口述

在旧社会，我們侗族穷人，同样受着地主的迫害。那时候，我给地主放牛，服侍牛，是牛的牛，比一头牛还低下！过着不如牛的生活。

解放前，我家有六口人，有半亩山茅地，好的年成，也只能收百多斤杂粮。为了养活全家的命，爸爸去给地主当长工，妈妈给别人打短工。可是，在那些年头，就是你有再大的力气也无法养活自己，爸爸常对我们兄弟姐妹说，满了十岁的，都得到外面自己找饭吃。我姐十岁，就去给富人家带孩子；我哥十岁，就去给别人放牛；1948年，当我满十岁的那天，也到本村地主吴廷智家去养牛了，开始和牛一起，过不如牛的生活！

和我一起到吴家去的，还有一个同村小孩。他十四岁，力气比我大得多。从那时候起，我们就成了吴家那群牛的牛了。

地主要我们把他的牛养好、养肥。但是，村子周围都是石山，没有草，没有水，我们得把牛赶到离村子十里八里甚至几十里远的土山上去扎营，在那里搭起草棚，和牛住在一起，和牛睡在一个棚子里。一年四季，看不到家，看不到人，两个人孤零零地在荒山里过日子，受尽折磨。地主十天八天

派他的管家来检查一次牛，遇上管家不如意的时候，不是藤条抽就是骂娘，说我们是野狗，不给我们送米来。我们常饿着肚子，靠挖山薯、捡野果过日子。长年吃不到油盐，头发都变白了。没有衣服穿，脊背叫太阳晒得又紫又黑，都晒裂了。头发乱得像个鸡窝，有时半年也不能剃一次头。又白又长的头发，披盖在乌黑黑的光肩膀上，别人乍一看都认不出我们是人，简直像个怪物。

我们把牛从这个垌场赶到那个垌场，风里雨里，忍饥受



饿。由于住在潮湿漏雨的茅棚里，经常得病。黑沉沉的夜晚，茅棚外经常传来虎狼厮打搏斗和凄惨的嚎叫声，有时成群的野兽来叩打我们的门，要咬棚里的牛，我们两人害怕得心惊胆战，毛骨悚然，心想不知哪夜，自己的命也会送进野兽的嘴里。可是地主哪管这些呢？他们不把我们当人，他们要我们把牛养好养肥，还要给他们砍柴火，一天到晚不叫我们休息。可我们得到的是什么呢？

那年年底，地主说要给我们两人六个角子回去过年，我

們真是高興。誰知，就在要領錢的那天，我們煮飯用的那個小沙罐被牛踩爛了，地主就扣下了四個角子，剩下兩個，我們各分一個，這就是這一年的“工資”呵！

以後，可恨的事情又發生了，那是在將要過年的前幾天，地主要我們把牛趕下山來，讓牛在家過年晚。下山那天，有一頭公牛突然失蹤了，找了很多天也未找着，這可了不得！我們找呀找呀，心里十分害怕，擔心着那可怕時刻就要到來。就在除夕那天晚上，家家都在過年，地主却把我叫了去，我看到他那副吓人的面孔，身上直發抖。但出人意料，地主却改了口氣，非常和氣地對我說，叫我回去請媽媽來，到他家裏一起吃“團圓”飯，因為我們都是姓吳的。但我還是半信半疑，誰知地主又要什麼花樣呵！因為我知道，地主不會好得那麼快的，我爸爸說過，天下沒有一個地主是好人（我的爸爸就是受不了地主的欺凌，才跑上山去參加黨領導的游擊隊的）。果然不出所料，我媽媽還未跨進門口，吳廷智那副兇惡極惡的猙獰面目就暴露出來了，他揮着鞭子，張着嘴，象一頭青面獠牙的妖魔，暴跳如雷地抓着我的脖子狠狠地把我摔到媽媽面前，破口大罵，揚着鞭子就要劈下來，說我年三十晚丟了他的牛，觸怒了他的家神，要把我趕進牛欄里去頂替那頭牛。我媽媽跪着苦苦哀求，說什麼也不成。四個狗腿子就連拉帶拖連踢帶推的，把我丟進牛欄里，鎖起來了。我哭着叫着，可是，有誰來救我呀！

牛欄是在村外，那天晚上，外面正刮着風下着雨，風雨從破爛的窗口撲進來，冷的刺人骨髓。牛欄里滿是牛尿牛糞，又臭又冷。那晚上我沒吃一點東西，腳又站在冷冰冰的牛糞堆里。牛睡着了，我緊偎縮在牛的身邊，靠牛的身體暖着自

己，我从破窗口往外看，外面是黑沉沉的，什么也看不见。肚子又饿身上又冷！心想：今夜，还有别的孩子也象我受这样的灾难吗？我一边哭一边骂着这个黑心的地主，可是有谁会听到我的哭喊声呢？有谁来救我，谁来管我？爸爸今夜又在什么地方呢？在哪个山头呢？听说游击队是专门打地主压富豪的，我多么希望爸爸回来救我呵！可是爸爸会不会知道他的儿子正在受苦。牛栏外又刮进一阵刺骨的寒风，我全身冻的麻木了，昏昏沉沉，失去了知觉……

不知什么时候，爆竹声和锣鼓声把我从迷糊里震醒了，我想翻个身，可是翻不起来，原来昨晚躺在冰冷的牛屎坑里，半个身子完全冻僵了，我只好拚命地睁开眼睛，才知道天已经亮了，今天是大年初一呵！我挣扎着向门边爬去，想看看今天外面是什么情景！在往年的这一天，我总会是住在家里的，不管怎么穷，爸爸也要买几个爆竹给我，让我和村上的孩子们一样能玩个痛快。可是这个时候呵，我变成囚在笼里的一只小鸟了！我身子麻木得不能动弹，爬也爬不动，我透过缝隙望着天空，天空是那么灰沉沉的，我斜耳倾听，在冷寥的锣鼓和爆竹声里，村上传来了吴家和别的几家富豪的狂笑声和酗酒猜拳的叫喊声。等到吴家吃饱喝足的时候，有一个管家过来开门，我想乘机逃出去，当栏门一打开的时候，我正好爬到门口，这时吴廷智提着皮鞭，摇晃着醉醺醺的身子过来了，一看见我双手要爬出门口，他就怒冲冲地扑过来，皮鞭立即朝我脸上、背上象雨点一样劈下来，一边劈，一边骂道，“打死你这个小‘共匪’……”呵！我也是小“共匪”了！原来这样！……顿时，天昏地暗，我只觉血迷脸肿，皮开肉绽，昏过去了！

我的媽媽和祖母为了救我，向地主求情不行，最后只好設法湊了一些錢和东西交給地主，才算暂时把我贖出牛栏。但地主威逼我家，必須在三天之內把那頭公牛找到，否則就要我全家人的命。后来，經我媽媽和祖母四处奔走，才把那頭牛找着，总算結束了這場災難！

此后，我伤势愈来愈重，不能再干活，加上我是“共匪”的儿子，地主就把我赶出了村子，我是有家不能回，每天过乞儿一样的流浪生活。这些事直到現在我还深深地記着，我臉上的几处伤疤，就是那次被毒打留下的記号，它教育了我，使我永远不能忘記地主的罪惡。

(紅 波整理)

他沒有等到这一天

小凉山彝族奴隶家史

我的汉子布火是云南大理县人，他才有一張桌子高时，就被奴隶主搶到小凉山，当了賈巴家的娃子。

我原是四川大凉山莫西馬都家的娃子，四十年前，奴隶主把我一家人捆到云南，卖给小凉山的賈巴家。我长大了，賈巴家便把我配給布火，让我们替他生小奴隶，他好出卖。

布火同我很合心，沒有几年就生下三、四个孩子。眼看孩子一天比一天长大，奴隶主不知什么时候会把他們卖掉，布火和我很担心。我們舍不得吃，把奴隶主給我們吃的火草巴巴給孩子吃。只是孩子們沒有穿的，他們一年到头，不管下雨下雪，都是赤条条的光着身子，我和布火非常心疼。

布火心思很灵，他替奴隶主干活完了的时候，便到松树林里去挖茯苓。他一看那棵松树，就知道它們根下有沒有茯苓，他靠着这本事挖得了許多茯苓，然后背到一两百里外的汉族地区去出卖。

一天，他高高兴兴的回来了，流着汗水的臉上帶着微笑，我一見他那样子，猜到他一定換得我們需要的东西了，心里也乐哈哈的，赶忙燒火做飯給他吃。孩子們几天不見他，喜欢的跑到他的身边，一个拉住他的手，一个拉住他的褲脚，亲热的向他叫：“阿达！”布火顧不得揩一揩臉上的汗水，抱起

孩子來向他們問道：

“衣海，你要不要新衣裳？”

“阿達，要”。

“補海，你呢？”

“我也要！阿達，人家笑我露着光屁股！”

“好，阿達縫給你們，讓你們第一次穿一穿新衣裳。還有你媽也要縫一件，她活到這個年紀，還沒有穿過新衣裳哩！”

我聽着布火的話，心頭甜滋滋的。實在，我活到這個年紀還沒有穿過新衣裳，天天穿的都是奴隸主婆娘穿爛了不要的破衣裳，我多么希望穿到一件新衣裳呵！

我們那間破板板房內平常很陰冷，今天却怪溫暖的，布火同孩子們正在逗玩，忽然，那扇篾笆門被推開了，一個披着黑披毯的大漢彎着腰走了進來，孩子們一見他，就像小雞見到餓老鷹，吓得變了臉色，跑到我背後來躲着，誰也不敢露面。布火見了他，剛才一臉的笑容不知哪里去了，忙從火塘邊站了起來，恭恭敬敬的向他招呼，

“色坡，請坐。”

奴隸主賈巴烏可高傲的站在屋裡，臉孔拉得很長，那面容象滿天烏雲，兩只眼睛里噴出兩道怒火對着我漢子，好象要把他一口吞去。我一見他，心里就發抖，知道今天他進來不會有好事。果然，他站了一會，悶聲悶氣的向我漢子開口問道：

“這幾天，你到哪里去？”

“我一處沒有去。”布火從來不說假話，可是對賈巴烏可，他沒有敢講實情。

“你一處沒有去？你媽的，你敢哄我！”賈巴烏可放下臉，

脾气象暴风雨般发作了，他走到布火的身边，从布火背来的那支篾籬里用力一拉，拉出了一匹用羊皮包着的土藍布。

“这是啥子？你一处沒有去，哪里来的？”

布火沉着臉，一句話也不說。肚子里装滿了气憤，胸脯一起一伏的。

“我問你，这是哪里来的？是不是偷来的？”

布火的胸膛要气炸了，回答道：

“我挖茯苓换来的。”

“你还换得了什么？”

“别的沒有了。”

賈巴烏可不相信，在篾籬里搜了一会，搜不出什么东西，他又来搜布火的身上。这一搜，把布火藏在身上的一个銀子搜到了，他“啪”的順手打了布火一个耳光！

“你說沒有，这是啥子？你媽的，你这个死娃子心大了，



你不要主子了！”

我知道这只吃人的豹子眼睛一红，不会有好事，忙向他乞求道：

“色坡，他咋个敢这样，请你……。”

贾巴乌可不作声，拿起那匹土蓝布和那个银子，气冲冲的转身走出去。布火辛辛苦苦的挖了几天茯苓，又辛辛苦苦的背去卖了几天，想不到所得到的结果是这样，气得抱住两手发抖。我心里又是难过，又是气愤，对布火说道：

“唉，想弄点钱，哪里想到讨了大祸啦，咋个办？”

布火糊着脸，站在屋子里，

“他要咋个，随他！”

我料到贾巴乌可拿了银子和布匹去，不会就了事，他回头还会来处置布火。忙走过去推着布火说，

“他是一只吃人的豹子，布火，你赶快跑！”

布火望着那几个孩子，孩子们也呆呆的盯住他。

“我咋个忍心丢下你们？我死也要同你们死在一起……”

布火的话没说完，贾巴乌可领着两个狗腿子冲进来，拉着布火的衣领就走。我跟在后面求饶道，

“色坡，请你饶饶他！……”

贾巴乌可一脸的怒容，两只大裤脚蓬蓬的在发响。他猛地转过头来瞪了我一眼，

“饶他？妈的，他的心比老虎的还大，不晓得主子了，非叫他知道老子的厉害不可！”

我当时苦苦向他求情，他也不答应。布火一句话也不说，被他们拉进牛圈里，绑住两只脚倒吊起来，他不住的挣扎，汗水象雨滴一般的落下。……

“色坡，他不敢了，請你饒饒他。”我望着布火，心里疼得要命，眼泪不断地滚出来。我恨不得一口咬死賈巴烏可，他們害死了多少娃子。

这个一点心肝也沒有的奴隶主，見我进了牛栏，看出我想救布火，他使用力把我推出牛圈，关起門来。我靠在牛圈牆上，只听到牛圈里响起一陣嗚嗚的皮鞭声，和布火痛苦的掙扎声，我不觉打了一个冷噤，两脚站也站不稳，一跤栽倒在地上。

奴隶主的皮鞭不知抽去了布火身上的多少血肉，皮鞭声响一下，我的心跳一下。我的泪水已把衣裳淋湿了，硬骨头的布火却不向奴隶主討饒。奴隶主看他这样强硬，把他的衣服剥去，抬进一籬松香来，用明子将松香燒化，松香象滚油一般滴在他的背上。哎哟！他的背脊一下紅肿起来，象一个烤熟的巴巴一般，皮肤也燙烂了，露出一层鮮紅的肉，松香仍然不停的滴下去。硬骨头的布火咬住牙根，还是不向奴隶主討饒。

“你曉得主子，曉不得主子？”

布火一句回答也沒有，他快要气炸了，我只听到他的喘气声，掙扎声。这时，我想：你是什么主子？你不过是一只吃人的豹子，你吃了多少娃子，連骨头也不剩一根，你还要再吃我的布火。我生气的站了起来，想冲进牛圈里去，剛剛站起，眼睛一黑，便昏了过去。……

布火被吊了两天，只差一口气就要死了，奴隶主不願意让他白白死去，把他放了出來。我的天！才不过两天，布火已經被折磨得不象个人了，他的两只眼睛凹了下去，两个額骨凸得很高，臉皮黃得象蜡一般，身上尽是一条条的鞭痕，一

个背脊烂得叫人不忍心看，孩子們一見非常害怕，赶忙縮着头躲在一边。

“我叫你跑，你为甚么不跑？你看看，还象个人？”我哭着对他抱怨。

“我舍不得孩子，舍不得你……”布火躺在地上有气无力的說。

布火的心，我知道。他实在舍不得孩子和我。但奴隶主这样毒辣，怎么生活下去？

布火的伤慢慢的好了后，他跟我悄悄的商量逃走。我說，这几个小孩怎么带走？他想不出主意来，便下决心带着大儿子衣海先走，并答应以后想办法来接我們。我舍不得他父子二人走，但想到他們逃出去才是一条生路，便忍着挖心割肝般的难过，让他們赶紧走。

那天晚上，我睡也睡不着，布火同衣海睡在一起，也在翻来复去。村子里的狗一会在叫，一会又靜了下去。布火怕奴隶主沒有睡，不敢起去。直挨到鸡叫，才背着衣海輕輕的开了門，閃了出去。我明白他走了，也許从此一去不来了，我对他不敢說一句話，眼泪只是不停的淌。……

布火背着衣海走了后，賈巴烏可知道了，派人到处去找。我为他們父子二人担心得飯也吃不下去，水也不想喝，天天心惊胆顫的。要是被找回来，他們父子二人一定是沒有活下去的指望了！幸亏賈巴烏可沒有把他們找到。可是，从此他对我們一家人管得很严，我們走远一步，他也不准。

日子慢騰騰的过了一年，我做了多少梦，梦見了布火和衣海呵，他們有时在家里烤火，有时在山上砍柴，有时在山地上为奴隶主干活，一切就象过去一般。我睜开眼睛，不見他

們，心里难过得很！他們到底跑到那里去？日子过得好不好？

一天，我正在焦急，忽然，村子里的人跑来对我說：布火和衣海被馬海家抓到了！

天哪！这是怎么說呢？原来布火領着衣海跑到永胜县的金官鎮，在这个汉族聚居区住了一年多，給人帮工过日子，还可以馬馬虎虎的混下去，想到我們在这里受苦，父子二人又跑了回来，躲在村子对面的那些老林里，天天在望我們；想把我们接到金官鎮去。誰知馬海家这家奴隶主到老林里去打麂子，布火和衣海就被他家看到了，他家搜去了他們身上的东西，还把他們捆起拉回去，然后带信給賈巴烏可，叫賈巴烏可拿銀子去贖。賈巴烏可回信說：“我家的娃子象麻雀一般飞出去，你家拿住，尽管打死好了，我不怪你們！”我听了这些消息，站也站不稳，身子一晃，差点就昏死过去。唉！布火呵，布火，你跑出去了为甚么又回来找死？凉山到处都有吃人的奴隶主，你提防了賈巴家，为甚么不提防馬海家？这次不单你遭殃，連年輕輕的衣海也沒好結果了！

我的眼泪只是不停的往下流。突然，馬海家带信来給我，他家不願意打死布火和衣海，叫我拿銀子去贖。我絕望的心里又有一綫希望，只要可以贖，我不管死活一定要去贖他們父子二人。我連忙到亲戚朋友家里去張罗銀子、牲畜。跑了几天，算是湊合得了六个銀子，十七只羊，一口猪。馬海家已答应让我去贖。这时我想到，我把人贖回来，那只吃人的豹子——賈巴烏可，是不是会将他們打死？我不得不去同他商量。

“阿葛，你贖回来，我不打他們，仍然叫他們替我干活，你放心！”出乎我的意料之外，賈巴烏可今天表現得很仁慈，

一点也没有平常的那凶恶样子。

馬海家沒有刁难，解开了紧紧的勒在布火和衣海身上的绳子，让他们同我轉回家。他们走路也不会走，由我扶着走。几个孩子见了他们的阿达和哥哥，喜欢得眼泪也流出来了。誰料这时賈巴烏可起了黑心，傾着两个狗腿子，一脚踢开我家的門，拉起他父子二人走出去。

“色坡，你不是答应过不打他们，怎么又——？”我惊惶地质問他。

他板着脸，一声不吭。将布火和衣海拉到曠地上，抱起一块块石头来砸他们。那样子好象瘋了一般。那两个狗腿子也动手帮助打，一眨眼，布火和衣海父子二人被打得头破血流，身上穿的那套破衣服也被血染紅了。我赶忙跑过去救他们，石头不断地打在我的身上。我不顾一切扑在布火的身上，那两个狗腿子把我拉开，无情的石头仍象雨一般的向布火和衣海身上砸下去。

奴隶主打了一阵，大概打乏了，他们回去休息了。我走过去一看，只見布火滿身是血，閉了眼睛，直挺挺的躺着。衣海睡在地上手脚还在动。我赶紧把衣海背回去，然后走出来坐在布火的身边，我想他昏过去了，不忍心叫他，免得他醒来身上的那些伤太疼痛，这时，一个邻人走来摸了摸他的手脚，对我說道：

“大嫂，他已经死了，你还守着他干什么？赶快抬开烧了吧！”

“不，他还会活轉来的，他身上的伤太疼了，让他靜靜的睡一睡。”

“他的手脚已冷了，嘴里一点气也没有，怎么还会活？大

嫂，不会有望头了！你没有人帮忙，我帮你把他抬出村子去！”

我摸一摸布火的手脚，真的已冰冷了，我忍不住放声大哭起来。两个邻人把他抬到村子外边，准备第二天背柴去烧。到了第二天，谁知布火又活转来了。贾巴乌可还不饶他，派狗腿子又来将布火拉进牛圈里。

他们怎么处置他，我不知道。过了一天，他们把他从牛圈里拉出来，只见他只有出的气没有进的气了，他睁开眼睛望了望那几个孩子，吃力的喘着气说道：

“我……不……行……了！你们……为我……报仇！……”

说完，他就闭起眼睛，一动也不动了。尽管孩子们哭喊，他也不再睁开眼睛，他带着满腔愤怒，带着一身痛苦，离开那个可怕的世界，离开那些吃人的奴隶主了！

1956年，小凉山解放娃子时，那些吃人的奴隶主不愿意娃子解放，反对改革，去当土匪。我的大儿子就去当民兵，后来又当解放军，天天爬高山，钻老林，打土匪，立了三等功，升为副排长。土匪消灭后，我的二儿子补海到丽江民族干训班学习，毕业回来当了大瓜坪农场场长。他的媳妇是他的同学，两人自主自愿结婚，当了农场的畜牧员。三儿子克海，在解放军里当副班长。三个儿子都是共产党员，二媳妇是青年团员，现在我们一家人靠着共产党、毛主席，过上好日子了，只是我的布火，他没有等到这一天……

(李乔整理)

千万不能忘記过去

阿尤甫口述

我們乡間有句俗話，“地主的庄园，穷人的地獄”。我家祖祖輩輩都是在地獄里过的呀！我爷爷、我爸爸生下来就是奴隶，我也戴着奴隶的鎖鏈过了六十三年。現在我回想起那些日子，眼泪就禁不住往下流，心啊，象刀絞似的疼痛。那苦难的岁月，那血泪的仇恨，我怎么能忘記啊！

地主的蝎子心

我是維族人，出生的时候，家里房无一間，地无一亩。我一生下来就受罪，吃不飽、穿不暖。好容易长到八岁，地主姆瑪吉見我能下地帮大人干活了，就硬把我要去当小长工。爷爷、爸爸和我三代人一起給他当长工，日夜劳累，每天只給我們一人一块高粱饅。餓了就到坎儿井旁去喝冷水，嚼几口干饅，从来沒有吃过一頓飽飯。

这样的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在我十四岁那年，爷爷便帶上爸爸和我，离开吐魯番县牙尔湖村，逃到达坂城，給回族大地主赵嘉扛活。灾难到处跟着我們，这里照样是个沒底的魔窟。地主的心，蝎子的針，毒得很啊！

有一年冬初，活儿特別重，我們整天为地主打場，拉麦子，干到天黑才收工。每晚都是躺下不久，就听到鸡叫，接

着就被地主赶起来干活了。可是，套上车走出二三十里路，天还不見亮。我們都怀疑，怎么天天鸡叫得这样早？一天，先听到外面鸡飞狗跑的声音，接着公鸡就打起鳴来，这时地主拄着拐杖来喊道：“鸡都叫半天了，还不快上工？”我跑出去一看，什么都明白了。原来地主的狗腿子披个褂子，打着一双赤脚，偷偷地蹲在一棵桑树下用拐杖轰几只公鸡打鳴。这个地主狗腿子自己也怕睡过了头，晚上在枕头两边放两块大銅錢，睡一觉翻个身，腮帮子贴在冷銅錢上，便惊醒了，起来轰鸡打鳴。

有一年冬天，地主叫我赶車到南山拉木料。馬車剛剛翻上冰达坂，車重路滑，人饥馬乏，在一处弯路上，翻了車，我右腿被軋伤。我顾不得自己，赶快去救压在轅下的馬。我想，“馬要是死了，我也就活不成了！”我拚命把馬扶起来，馬猛一蹦，冲出去，車轅子撞到我嘴巴上，两个門牙当时就被打活了，滿嘴的血。車輪子又軋了我的左腿，我疼得昏过去了。幸好遇上了几个哈薩克兄弟，七手八脚地把我扶起来，替我包扎腿伤，又帮我把軋伤的馬寄存在别人家里，另借給一匹好馬套上车，让我回家。回家后地主一听說馬軋伤了，立即瞪着眼睛大罵，“你这个狗崽子！我的馬腿断了，我也要你的腿打断！”說着就用棍子給我一陣毒打。以后，不等我把腿伤养好，他又逼我去套車干活。最毒狠不过的是，軋伤的那匹馬的腿已經好了，牵回来还干了一个多月活，但后来得了病，地主硬說这病是那次运木料摔的。他把馬宰了，馬肉、馬皮他都卖了，却給我家記了一笔債，要我們賠馬。天哪！这笔冤枉債我們哪年才能还得清啊！

还不完的奴隶债

在这里实在没法过下去，家里妈妈和弟妹又无依无靠，我们爷三个就又逃回到吐鲁番，给地主玉素甫干活，还跟他伙种了八亩薄地，他出地，我们出种子和全部劳力，打下的粮食一多半要交给地主，一年顶多剩一石多粮食。回到吐鲁番没几天，达坂城的地主就来要债。我爸爸向地主玉素甫哀求说，“我们爷三个给你干活，你就给我们些钱还了债吧！”玉素甫咧嘴笑着说：“这没关系，以后你们好好干就成了！”爸爸想：“这可搬去了头上的一座大山！”哪知道，那一匹马的债，我们苦干了几年也没有还清，另一座大山又压到头上了。

我有个表妹叫买米尔汗，妈妈死了，只丢下她孤苦一人，就到我家与我成亲。我家穷得哪有钱办婚事？又得向地主玉素甫借债。他又咧嘴笑着说：“儿子娶媳妇是好事，用多少尽管说！”我爸爸哪里敢多用，只借了十三两铜钱，这就又欠下了地主第二笔债。

就为了还这两笔债，我们日夜为地主下苦。我和爸爸给地主种麦，割麦，打场，干重活，爷爷年岁九十多了，干不动，也还要看羊割草，干零活。我和妈妈也在地主家里当佣人，洗衣服，带孩子，烤馕。有一天，地主让我们爷三个从场上往仓库背麦子。爷爷年岁大了，又有肺病，干轻活都气喘，怎能背得动？我就向地主哀求说：“巴依老爷，让我多背几趟，替他干吧！”地主阴笑着说：“我出的是三个人的工钱，都得给我干去！”这样，爷爷终于被口袋压倒，抬到家里不几天就死去了。可怜的爷爷死后连块裹尸的大布也没有。我们又向地主苦苦哀求，借了两块大布，才埋葬了爷爷。可是，又

欠下了一笔债。旧债未了，又添新债，哪年哪月才能还清？

地主总是不把穷人当人看的。我们不光是挨饿受苦，受尽剥削，还要受种种压迫和欺侮。地主的大儿子坎吉尔见我妻子年轻，就乘我出外干活的时候调戏她，污辱她。有时坎吉尔还故意把我支使到戈壁滩放羊，一去三、五天。我每次回家，妻子就整夜地哭，向我诉苦。我实在受不了这个气，就到地主那里去算帐：“我不干了！”地主一边骂，一边拨算盘珠：“你吃我的粮，住我的房，你家老婆是我给娶的，你家死人是我给葬的……”算来算去，我一家人为他苦干了整整九年，到头来还欠他家一笔一辈子都还不清的债。

后来，我又带着妻小逃到吐鲁番牙尔湖的地主阿不列孜阿吉家里扛长活。但是，从狼嘴里脱身出来，又投入了虎口。在他家扛了三年活儿，真是胜过受三百年的灾难。

我有个六岁的小女儿叫帕提玛，长的好看极了，大眼睛，小脸蛋，一笑一双大酒窝，十分招人爱。可惜她从小吃不到饱饭，长的瘦小，又常生病，这就更使做父母的怜爱。有一次，她生了病，两、三天吃不到一顿饱饭，只能喝些高粱糊糊。孩子哭一声喊一声地叫：“妈妈呀！要吃饭啊！”“爸呀，我饿呀！”我听着，心疼得什么似的。那时贪心的地主嫌我干活儿还不够卖命，故意不给我饭吃。这样一连过了几天，大人能经住饿，病了的小女儿怎么能受得了！在一天夜里，她饿得直哭了半夜，到天快亮时，停了哭声，死了。临死时还张着那小嘴巴，小肚子饿得瘪瘪的。我妻子买米尔汗看到小女儿这样活活地饿死了，一时哭得死去活来。

小女儿死了不久，我妻子又去给地主烤饊，饊坑烧热了，要从屋里把装面的大木盆端出去，我妻子已有九个月的身孕，

哪能端得动！她去求地主老婆派个人帮忙，地主老婆却骂道：“一个毛驴一个馱子，你不端誰端！”妻子只得咬紧牙端起这只沉重的面盆。不料刚走几步，她就觉得眼前发黑，双腿发软，身子晃了几晃就栽倒了。面盆正压在她怀孕九个月的肚子上，疼得她呼天喊地，手抓脚蹬，不多时胎儿流产了，地上留下大片的血！死去的胎儿用一片烂布裹着放在一边。誰看了这情形都伤心地落泪。可是地主老婆来到跟前，把头巾往下拉了拉，看了看，吐了几口唾沫就走了。真是狠的心腸呀！当天，妻子也就惨死了。我的孩子、妻子活活地死在这个虎口里。吃人的旧社会，害死了我的爷爷、爸爸、媽媽，现在又夺去我的妻子。这样的苦难，这样的仇恨，我永世难忘！

两个苹果两条命

从阿不列孜阿吉地主家里出来，我又带着孩子先后到沙他尔卡里、比赛尔、吐木尔乡約、阿不来特等几个地主家扛活，一直干到六十三岁。地主阿不来特家有一个果园子，里面的果树都是我一手給他栽培起来的。但是里面的果子，我們却不能动一顆。有一年夏天，苹果快熟了，我在地里干活，失去了母亲的两个孩子，一个三岁，一个六岁，被丢在家里，没人照看。家里要茶沒茶，要饑沒饑，两个孩子餓得直哭。哥哥領着弟弟来到果园子里，看到地上一些被風搖落的烂果子，就拣了两个小的遞給弟弟充饥。誰知被地主看見了，他抄起了棍子連打帶罵，直打得兄弟二人口里直冒血！当我晚上下工回来时，两个孩子都已不省人事了。叫了半天，才睜开肿得象桃子一样的眼睛。我气得去找地主阿不来特，問他凭

什么这样打孩子？还未等我說完，他就像条瘋狗一样扑过来，用脚狠狠地踢我，把我赶了出来。第二天，孩子的伤更重了，有生命危險，我急的在屋里直打轉轉，就又去找地主哀求說：“孩子快死了，行行好事，借些錢治治吧！”地主怒罵道：“你在我这儿存了多少錢，我哪有錢給狗崽子看病？”就这样，我眼睜睜的，又看着这两个孩子死去了！

我一共有十个孩子，有的餓死，有的被打死，現在只剩下一个儿子利提甫了！就是这一个孩子，我也养活不了，在他还不滿十岁的时候，就被地主沙他尔雇去放羊了。利提甫年岁小，白天放羊，晚上还要干零活，把个娃娃累得团团轉，飯又吃不飽，觉又睡不好，看了实在让人心疼。有一天，他放羊，放着放着，就睡着了，被地主看見了，一边罵，一边用鞭子打。孩子受了伤，又受了怕，从此病了一个多月才起床。我原指望孩子的命运会比我好些，但是，他也从小就套上了奴隶的鎖鏈，开始了奴隶的生活。

打碎奴隶鎖鏈

我解放前过的六十三年，是在地主的牢籠里度过的。那不是人的生活啊！只有解放后这十四年，才是我真正的生命的开始。

解放了，我們这里来了了解放軍，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51年，我們村里来了减租工作队，发动我們这些貧雇农訴苦，向地主斗爭。在斗爭压迫剝削我十五年的恶霸地主阿不来特和殘害我妻子的地主阿不列孜阿吉的大会上，我跑到台上指着他們的鼻子問：“你的地誰給开的？你的房子誰給盖的？你欠下我家多少血泪債！”如今我們穷人翻了身，又有共



产党和毛主席给撑腰，我才把在心里积了几十年的苦水全倒出来了。我在台上诉苦，穷朋友们在下面哭，地主们被我们问得理屈词穷，个个低头认罪。

减租反霸中，我被选为农会主任。不久，又开始了土改。地主看我人老实，平时不大多说话，就想来收买我。有一天，被我们斗倒了的地主阿不来特凑到我的身边，把烟递给我说：“阿尤甫阿哥，抽一支烟吧！”我把他的手推过去，说道：“谁是你阿哥！”又有一天，他说是家里有些事，要请我办一办。我刚走到他门口的石阶上，就闻到屋里飘出抓饭包子的香味，知道有点不对劲儿，就问他：“你找我来到底有什么事？”他假惺惺地笑着说：“你给我干了这么多年活，老交情了，到家里吃个饭，有什么话都好说！”这个阶级敌人竟想来收买我！我气得大声骂起来：“真是瞎了眼，看错人了！赶快滚开，

滾！”

土改中，大家都說我过去受苦最深，把地主原来住的高房大屋給我分了三間，把最好的地也分給了我。分地那天早晨，我早早地就跑到地里去。有一块田插上了一块木牌，上面用紅笔写着：“分給阿尤甫哥一等地一十五亩”。一个工作組的干部問我：“阿尤甫哥，这地是你的了，你看怎样？”我感动得哭了，跑到我的地里，伏下身去，連連亲着我的土地。我对他們說：“我要謝謝共产党，謝謝毛主席！”这一天，我还分到了一匹馬，一辆驴車和一些农具衣物。这天夜里，我說啥也睡不着。在我六十多年的生活中，常常是忧愁使我睡不着，現在是第一次幸福和兴奋使我睡不着。第二天一大早天还未亮，我就同儿子在这块地上掄起簸头，开始了新的生活。

步步跟着毛主席

1950年的春天，我到乡政府去开会，第一次看到了毛主席的照片。我立刻奔到他老人家照片前，躬身向他老人家致敬，問候一声“你好！”从此，毛澤东这个光輝的名字就沒离开我的心窝。后来，我在家里也挂上了毛主席像，一天我进出几次，就向他問候几次。有时連作梦我也梦见毛主席，我觉得，毛主席就象来过我們的村子，这里的什么事情他都知道，他說的話，他的英明的指示，就好象都同我們商量过，句句都說到我們的心坎上。我听他的話，步步跟着他走，一步步走上了光明幸福的大道。毛主席号召我們成立互助組，我就第一个报名参加了第一批互助組；毛主席号召我們組織合作社，我就积极报名，同二十九个农民一起組成了我們县

的第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五星农业生产合作社。1956年，毛主席又号召我们组织高级社，我们的五星农业社就转为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了。1958年毛主席说：“人民公社好！”我听了，心呀都乐得快跳出来了，立刻入了公社，当了饲养员。

不忘过去的苦难

解放后这些年，我的生活真是大变了样。1963年秋天队里开了个新旧生活展览会，我就把解放前和解放后一些生活用具都送去展览。上面摆的是我的一双穿了五年没底的烂鞋，一件穿得掉了膀子的衫子，一条破棉裤，半床烂被子，三个黑泥碗，一个木头灯；下面摆的新东西是两条新地毯，两只新箱子，一条三丈长的花墙帷子，一件新条绒褂子，三床缎被子，三块新毡子，两件皮大衣，三双皮鞋，一双皮靴，还有一只闹钟，一架留声机。你们看，我的新旧生活差到哪去啦？现在，我家住的是高房，晚上睡的是木床，可是从前我哪睡过床！一年到头，冬天睡马圈，夏天睡在树底下，常常被蝎子螫。现在我家十口人，四个人劳动，一年收入上千元，家里有一头毛驴，六只山羊，生活过得美美的。公社化以来，我受到七次奖励和表扬，年年被评为“五好”社员。我儿子利提甫被选为副生产队长，是“五好”干部。儿媳妇热比汗是小组长，也是“五好”社员。毛主席给了我幸福，也给了我荣誉。

(吐尔逊、买木提明 整理)
(鄂光让、赵学文)